

供销合作经济

GONGXIAO HEZUO JINGJI



上海市松江区供销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

ISSN 1674-2516



9 771674 251210

2021

5

2021年10月28日版

总第210期

上海市松江区供销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



9月15日，上海市松江区供销合作社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市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马晨辉应邀出席，松江区商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区供销社主任陈仕军主持会议，区供销社系统正式代表、特邀代表等50人参加会议。

马晨辉在致辞中对松江区供销社多年奋斗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代表市总社向松江区供销社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表示，松江区供销社第一届领导班子肩负着新的历史重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着重做好三点工作：一是要以深化综合改革力度为关键，切实担起“供”的责任。二是要以提升为农服务能力为根本，持续提升“销”的水平。三是要以健全夯实治理机制为重点，巩固完善“社”的功能，抢抓历史机遇，努力比学赶超，在新一轮松江新城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开创新业绩、再铸新辉煌。

大会指出，松江区供销社在松江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的关心指导下，深入贯彻落实中发〔2015〕11号和沪府发〔2016〕16号文件精神，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松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紧紧围绕区委“一个目标、三大举措”战略布局，抢抓松江“三张王牌”发展机遇，推动改革再深入、实践再创新、工作再抓实，不断开创松江供销合作事业新局面，为建设“科创、人文、生态”的现代化新松江作出了应有贡献。

大会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松江区供销社建社70周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松江区供销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从“三农”工作大局出发，深化综合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拓展服务领域，加快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服务松江居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深入推进改革强社、服务立社、夯基建社、以企兴社、从严治社，为实现“百年供销”的伟大愿景而不懈奋斗！

全国总社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10月15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副主任韩立平主持会议并就贯彻工作提出要求，总社理事会主任、党组副书记梁惠玲出席会议并讲话。总社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重大意义，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阐述了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郑重宣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与坚定意志，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会议要求，总社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准确把握，不断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发扬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坚定不移地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要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等重大任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供销贡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指导思想、重大原则和主要工作，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内涵、理论内涵、实践内涵，是一篇充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纲领性文献。会议要求，总社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带头维护法律权威，认真贯彻宪法法律，强化法治思维和制度意识，增强依法治社能力。要在全过程民主中发挥供销合作社人大代表作用，畅通民主渠道，反映诉求，提出意见。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善于通过人大监督推动解决供销合作事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要加强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加强党的领导，为供销合作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源自中国供销合作总社官网）



主管单位: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

主办单位: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
上海市供销合作经济研究会

出版单位:

《上海供销合作经济》编辑部

主 编: 马晨辉

副 主 编: 孙 玮

胡建华

责任编辑: 陈 峡

发行单位:

《上海供销合作经济》编辑部

二〇二一年第五期

(总第 210 期)

2021 年 10 月 28 日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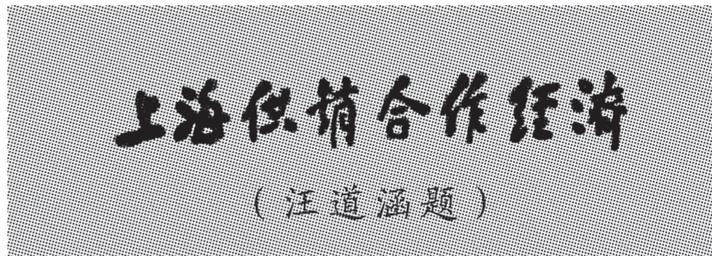
双月刊·公开发刊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4-2516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620/F



目 录

要闻专递

全国总社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1)

供销前沿

在传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发展……………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5)

老字号书写新篇章……………葛 颀(7)

上海供销e家今年运营销售收入突破千万……………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8)

上海供销社建设“供享家”……………李彩琴(10)

为农服务

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之我见……………苏振锋(11)

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金文成(15)

农村金融

论信用合作的创新……………陈 林(19)

大力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戴相龙(22)

转型进行时

传统菜市场转型的思考·····许 勇 (24)

探索农村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新模式·····

·····上海再生资源行业协会 (26)

他山之石

小农的现代化模式

——读董正华《走向现代的小农：历史的视角与东亚的经验》

·····葛志华 (28)

思政与党建

关于创建上海市离休干部示范党支部的思考·····顾雪莹 (30)

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强化思想政治工作·····谭利辉 (34)

供销钩沉

红色合作社史话·····朱国栋 (37)

商海拾贝

贸易驱动效应·····周 军 (42)

法制天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简介·····杨忠德 (44)

食林趣话

形形色色的烧卖·····钱桂华 (47)

方寸天地

徽州晒秋记·····刘古武 (48)



中国供销合作社
CHINA CO-OP

地 址：

上海市大木桥路 247 弄 2 号 2 楼

电 话：(021) 64183952

传 真：(021) 64183952

E-mail: gxxhgxxh@qq.com

邮政编码：200032

定 价：4.00 元

印 刷：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上海供销合作经济》杂志理事会成员名单

理 事 长：马晨辉

副理事长：（按姓氏笔划为序）

陈仕军 金慧明 祝加林

宫鸿冰 桑 佳 黄 胜

秘 书 长：孙 玮

常务理事（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晨辉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
上海市供销合作经济研究会会长

王心雄 上海市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王德强 上海市杨浦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田晓磊 上海新农村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朱国平 上海市奉贤区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朱松林 上海市长宁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朱建国 上海市金山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伍亚生 上海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 玮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合作指导部总经理

孙忠明 上海卢湾供销合作社主任

陈代凤 上海市普陀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陈仕军 上海市松江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沈金华 上海市青浦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主任

汪巍忠 上海市嘉定区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张自强 上海昊元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志鹏 上海好唯加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慧明 上海市闵行区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祝加林 上海市供销合作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赵志刚 上海市徐汇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宫鸿冰 上海市棉麻有限公司总经理

桑 佳 上海市浦东新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副主任

徐若海 上海市黄浦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黄 胜 上海市崇明区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

蒋国平 上海市果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 事（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超 上海市供销综合商社管理中心主任

朱建强 上海今晨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龙宝 上海浦东登丰农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葛 颀 上海邵万生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传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发展

——《城市名片——市供销社》在第一财经、学习强国播出

9月4日上午11:30，市供销社系统广大干部职工齐聚在电视机前或在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上观看《城市名片》第七集——市供销社。

《城市名片》是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在市委宣传部指导下，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四个放在”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上海市委市政府打响上海“四大品牌”，开启上海“四大品牌”新三年征程的工作要求，联合市场监管局“上海品牌”认证处及市“四大品牌”牵头部门共同发起的集中展示和推介上海“四大品牌”成果成效的专题节目。

近年来，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积极投身于上海“四大品牌”建设，传承创新老字号品牌，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保障商品供应，服务城乡居民生产生活，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赋予了“为农服务”新内涵。

市社党委书记程颖在节目采访中向观众们介绍了供销社：上海市供销社作为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与新中国共同成长，承载了“供”和“销”两个责任，“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就是体现供销社的背篓文化和扁担精神的一个缩影，也是供销社优秀的红色基因和优良品德。新时代下，作为实现“四大品牌”建设的一个特殊作用的平台，市供销社打造15家供销e家老字号品牌集成店，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

每个省市供销社都有自己特色的农产品，通过标准化的甄选把符合每个时节的优质农产品进入到供销e家，提供给上海的消费者和市民，把供销e家开到外省市供销社，把上海的优质农产品和老字号品牌走向长三角，走向全国，真正实现产地和销地，农民的生产 and 市民的消费进行快速地高效地对接，提升供应端到销售端的效率和性价比，通过“服务+经营”、“线上+线下”、“展示+体验+促销”，让更多全国的优质农产品进入到千家万户，为上海的“四大品牌”建设赋予新的空间和内涵，也为供销社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和新的活力。

节目分别从打造“为农服务”品牌、寻味“供销”老字号和新零售、新平台、新发展三个方面全方位系统介绍了上海市供销社系统近年来在“四大品牌”建设和创新转型发展中的工作成效。

打造“为农服务”品牌

都市农业是伴随城市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新农业形态，是现代农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作为为农服务的主渠道企业和现代农业服务的经营平台，从服务、经营、科技等方面为农民服务，更好地满足上海农民的农业生产需求。上海市果品有限公司作为上海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致

力于农超对接，把更多的优质水果推向市场，为市民的健康生活和农民的增产增收起到了积极作用。浦东供销联社承办了上海市的“果园公园手拉手，新鲜果品进万家”活动，促进产销对接，充分发挥农村流通的主渠道作用。青浦区社配合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农村综合服务点，形成工作机制，并开设了青浦进口商品体验馆，融合进口商品零售和社区综合服务两大核心功能，满足城乡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宝山区社积极打造地标性的社区商业，以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满足居民生活和消费需求，已成功打造了翼生活广场，翼生活轧花记忆园等社区商业。崇明区社围绕社区商业发展，提升为农服务，崇明万达商业广场开业，填补了崇明区长期没有大型商业综合体的空白，合作建设的清怡养护院开启了崇明互联网与岛屿养老新模式。长宁区社打造的“新锦华”商业品牌肩负起长宁区垃圾厢房、可回收物的托底收运保障新任务。

寻味“供销”老字号

中华老字号邵万生是黄浦区社旗下名品，坐落在繁华的南京路步行街，自170年前创立那天起，就经营南北货与宁绍糟醉，直至今日黄泥螺依旧热销。邵万生的糟醉加工工艺被评为黄浦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在第七代传人朱国伟的坚守与创新中传承与发展。邵万生旗下还拥有三阳、黄隆泰等百年老店、名特商店。同样位于上海市区繁华商业圈的，还有卢湾供销社旗下全资子公司——上海全国土特产食品商场，销售着酱菜和各地调味品深受消费者欢迎。嘉定区社旗下的名优特产郁金香酒出自南翔古镇，起源于明末清初，2009年郁金香酒的酿造工艺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传承人秉持古法工艺，用一代代薪火相传的技艺与初心，坚守着老字号品牌。奉贤区社旗下的上海鼎丰酿造食品有限公司，是始创于1864年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其生产的“进京腐乳”久负盛誉，是全国著名的优质腐乳之一。以“枫泾丁蹄”闻名遐迩的老字号品牌丁义兴是金山区社的集体全资企业，上海丁义兴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2016年在新三板上市。松江区社的余天成作为上海市最早的中华老字号药房，距今已有238年的悠久历史，2009年被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遗产评定为保护单位，在未来，余天成争取突破地域性发展，实现品牌全国化、世界化。上海好唯加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调味品的上海老字号企业，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唯加”牌系列调味品具有鲜明的上海地域传统文化背景和文化底蕴。

新零售、新平台、新发展

“供享家”是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盘活存量房地产，倾力打造的青年白领公寓社区品牌，从今年7月推向市场至今，入住率和签约率达到了70%以上，在满足青年居住需求的同时，积极探索青年社区共享的新模式，推进城市更新，服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的老字号社区新零售模式探索也初显成效，已在上海开设了15家“供销e家”老字号品牌集成店，目前已与重庆合川、江苏徐州、黑龙江哈尔滨、贵州遵义、西藏日喀则等20余家供销系统达成了战略合作，引进了其名特优新产品，未来将有更多全国各地的优质农产品，通过“供销e家”走进千家万户。

不论是服务乡村振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还是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充分发挥了其优势和作用。展望未来，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秉承“供销天下 合筑未来”的企业精神，践行“诚实守信、赋能成长、开拓创新、合作共赢”的企业价值观，在上海创新改革发展的时代浪潮中锻造出符合时代要求，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供销经营服务品牌，助推供销合作事业焕发新的光彩。

《城市名片——市供销社》节目一经播出，大家反响热烈，不仅纷纷在朋友圈转发“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同步播出，还表示作为一名供销人感到由衷的自豪，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共创城乡美好生活的供销梦，谱写出新时代更加绚丽的崭新篇章。

（源自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官网）

老字号书写新篇章

● 葛 颀

黄浦区是全市唯一的全域均为中央活动区的地区，在上海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大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如果说遐迩闻名的一张“名片”，那么这条商业街上的“王牌”便是“老字号”商家。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旗下的邵万生商贸公司（以下简称商贸公司）拥有三个老字号品牌，分别是邵万生、三阳南货、黄隆泰。邵万生创始于1852年，以糟醉、腌腊产品闻名沪上。三阳南货创始于1870年，以宁式糕点、高档南北货享誉沪上。黄隆泰创始于1918年，以经营绿茶为特色。三家老字号都坐落在“中华第一街”南京路商业街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在步行街街区里扮演着重要角色。面对良好的经营态势，商贸公司没有因步自封，将可持续性作为关注的重心，从商业业态、街区形态、文化神态以及消费生态四个方面入手，实现老字号转型升级，赋予老字号新的活力。

做好老字号的商业业态。树立品牌意识，抓住品牌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时尚性，能够引领消费需求；二是附加值，能给消费者带来精神享受。老字号首先应该是一个具有商业竞争力的品牌。为此，商贸公司一以贯之地打造企业品牌，在传承的同时着力创新企业老字号

品牌，赋予老字号以新活力，结合企业实际，打造老字号品牌产品。

体现老字号的街区形态。南京路“寸土寸金”，南京路上店家的核心竞争力，离不开一铺难求的商铺位置的优势。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传统实体商业遭遇“寒冬”，客流骤减，旅游消费持续萎缩。面对冲击，商贸公司化危为机，依托老字号品牌优势，围绕品牌开发产品，从而把企业核心竞争力由商铺转化为品牌和产品。同时以商业服务渠道为依托，开发自主品牌自制产品和定牌监制产品，并积极向原料端延伸，积极打造产业链，形成三产服务带动二产生产联动一产养殖。巩固了老字号品牌在街区的竞争力，体现了食品品牌在南京路街区的形态。

坚持老字号的文化神态。坚持打造品牌文化，持之以恒地积极寻找老字号的品牌基因。糟醉技艺是邵万生品牌的基因之一，宁式糕点制作技艺是三阳南货品牌不可或缺的重要基因。讲到邵万生品牌，离不开黄泥螺和醉蟹。去年疫情之后，瞄准市场需求，邵万生开发了糟醉小龙虾，糟香螺，糟带鱼等糟醉水产食品系列。今年又研发了糟醉禽肉产品和糟醉佐料，如糟醉鸡、鸭和香肠以及邵万生特级糟卤、特级虾油等产品。糟香肉粽、糟香（下转第9页）

上海供销 e 家

今年运营销售收入突破千万

8月31日，市社党委书记程颖，纪委书记岳凌军，理事会副主任马晨辉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赴上海昊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调研。与会领导对上海供销 e 家今年运营至今销售收入突破千万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并就下阶段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

市社党委书记程颖在讲话中强调，上海供销 e 家老字号品牌集成店作为新时代供销社为农服务新的抓手和平台，一是要坚定不移，不忘供销社为农服务初心，聚焦供销流通主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上海“四大品牌”建设。二是要坚持不懈，面对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攻坚克难，根据集成店“服务+经营”的定位，立足于把农民与市民、农业与商业、线上与线下、品牌与服务、品质与生活等真正融合发展。三是要坚韧不拔，聚焦产品开发、渠道拓展、市场推广等重点，持续推进集成店建设工作。

市社纪委书记岳凌军在讲话中强调，公司团队要正视困难，牢记初心使命，聚焦重点，创新机制和模式，并就从严治党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市社理事会副主任马晨辉主持会议并就下阶段扶贫 832 平台对接、产品结构不断优化等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今年以来公司多措并举，坚持以“服务+经营、线上+线下、展示+体验+促销”为基本运营思路，整合全国供销系统产品资源，不断优化产品结构，线上线下联动，拓展团购渠道，迭代与创新社区新零售新模式，提升集成店线上线下运营质量。截止8月31日，集成店上海供销 e 家今年运营至今累计销售收入 1019 万元，预示着集成店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线下：“深耕社区+辐射商务楼”模式实现快速获客

上海供销 e 家集成店定期与 15 家门店周边居委及物业联合举办“社区大篷车”、“老字号产品进社区”等试吃体验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同时与市国资委系统企业、外滩金融机构、门店周边商务楼合作，今年利用午休时间成功举办 14 场“快闪集市”，吸引年轻粉丝，为线上微商城引流的同时拓展企业团购渠道，提升上海供销 e 家品牌影响力。

线上：自有平台的数据积累 + 合作平台的渠道拓展

上海供销e家集成店依托“公众号+小程序”一体化微商城的数据积累，实现精准营销。通过社区拼团、社群营销、直播带货新模式，创建“供小社”、“供销食验室”抖音号，利用“微信小程序+公众号+抖音+社群”的现有线上平台矩阵，在白渡路打造公司首家店铺直播间，通过首店经济和店铺直播间的打造为线上销售引流涨粉。积极培育自有直播团队，以“内容营销+短视频+直播”为抓手，将不同的食材故事、产地文化、品牌展示与品牌体验同步在线上线下进行宣传，实现线上+线下销售的真正融合。

服务“扶贫832”平台助力脱贫攻坚

上海供销e家集成店依托“扶贫832”平台，助力脱贫攻坚。与惠民超市积极对接，做好832平台上海销地仓的服务商，提供产品甄选、展示展销、平台培训、售后客服、宣传推广等相关售前、售中、售后精准服务。完成15家集成店线下门店提供约10m²扶贫产品专区

打造，确定扶贫产品名录进行展示展销，定期开展扶贫产品试吃体验活动。组织公司业务人员及销售人员进行采购流程培训，制定服务清单，为预算内外单位提供“扶贫832平台”“代下单”等服务。建立预算单位采购人客户管理系统，定期做好相关售后服务，实现扶贫产品采购人到企业团购客户的转化。

线上线下联动，打造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平台

上海供销e家集成店作为平台和“买手”，根据二十四节气甄选全国名特优产品，通过“线下体验+线上销售”的新零售模式，为全国名特优新产品进沪销售搭建线上线下立体平台。今年以来积极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供销社老字号暨供销市集嘉年华活动”、第二届上海互联网青春生活节，成功举办重庆合川优质特色农产品“上海·合川”周活动，实现产地与销地、农民生产与市民消费高效对接，从田头到餐桌，缩短农村和城市的链接，让全国更多优质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提升供应端到销售端的效率和性价比。

(源自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官网)

.....

(上接第7页) 月饼、芝士火腿月饼、邵万生糟咖啡等“脑洞大开”的创新食品迎合了人们追求“新”“奇”“特”的心理，一经推出，便受到了消费者的追捧。下一步根据三阳南货店自主品牌、自制产品占比35%，定牌监制产品占比35%的目标，以品牌文化为引领，开发品牌特色产品，不断丰富老字号品牌的文化神态。

优化老字号的消费生态。自去年以来商贸公司积极开拓网上销售渠道，目前已经形成了线下与线上“3+3”的渠道模式。线下实体店包括南京路旗舰店、社区连锁店和南京路东拓段主题特色店；线上网络渠道有电视购物、大平台电商和社群营销。邵万生糟香系列月饼除了在线下实体店销售，还通过抖音、天猫、小程序等平台营销，中秋期间线上和线下销售每天超15万元。三阳苔条月饼礼盒在“好吃记得

夸我”节目与小程序联动，50分钟销售100万元。中秋期间三阳月饼每天销售额接近25万元。经过多年探索，商贸公司已初步形成线上与线下全网络联动的销售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给实体零售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然而，商贸公司化不利为有利，加速调整转型，内在的核心动力已然形成，并以此推动企业发展。今年1-8月商贸公司实现销售额2.98亿元，同比上升28%。

当前，南京路商圈已整体呈现向国际化、年轻化、潮流化转型的新趋势，这对老字号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商贸公司将乘势而上，以老字号品牌文化为底蕴，展示国潮文化力量，为营造良好的南京路商业业态、街区形态、文化神态以及消费的生态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上海市黄浦区供销合作社)

上海供销社建设“供享家”

● 李彩琴

“住有所居”是人们最朴素也是最迫切的愿望。不少在大中型城市工作的青年人、尤其是新市民面临着住房难题。为了帮助“新上海人”解决“住房难”问题，上海市供销合作社尝试打造了青年社区长租公寓，让“沪漂”青年在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里有了一处安身立命的港湾。这家冠名“供享家”的青年长租公寓，地处市区中心，地理位置优越。公寓内部设计简约时尚，配套生活设施完善，深受年轻租客喜爱。“供享家”的“供”，来自供销合作社的第一个字，与共享经济谐音。

“供享家”的“前世”是供销合作社的一家仓库，位于上海火车站及静安大悦城核心商圈附近。整个公寓社区由3栋楼组成，总建筑面积约6500平方米，含152套公寓。主力房型以一居室和LOFT为主。1号楼为租客提供生活配套服务，2号楼为公寓大堂、配套服务功能区域及公寓房间，3号楼定位于共享办公及社区配套，是为公寓及周边社区提供商务服务的空间。长租公寓内除了洗衣机、冰箱、空调、数字电视、热水器等一应俱全的家用电器之外，还有健身房、共享厨房、书吧、咖啡吧、影音室等公用配套设施，保证了租客日常生活的舒适与便捷。

租户乔小姐掩饰不住对公寓的喜欢。她说：“设施、环境都可以，刚住进来时有点小问题，但管家很快就给解决了，整体感觉很不错。”

选择了LOFT房型的邹先生和胡小姐是“海归”族。除了房间的装修和地理位置令他们十分满意外，干净整洁的公共厨房和大容量冰箱

让他们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并且十分享受这种感觉。

昔日的老旧仓库，变身为新型业态，盘活的是存量资产，“变现”的是供销社的服务理念。

“供享家”于今年6月23日开业。在管理上参照酒店模式，奉行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同时根据租赁房的特点进行运营。瞄准都市青年的住房需求，在房间户型、设计装修、配套设施等方面动脑筋，做文章，满足青年对‘家’的念想。目前“供享家”的入住率达到70%。

解决青年职工、新市民的住房问题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要义之一。“供享家”的开业运营，是上海市供销社根据自身特点，盘活存量房产资源，配合城市更新，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

上海市供销社直属企业上海昊元资产公司总经理助理贺磊表示：“‘供享家’的前身是供销合作社的仓库，如果改造成写字楼或商铺等商业项目可能会带来更高的经济收益。但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将上海市供销社的发展进一步融入到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格局之中，如何发挥供销社的服务功能。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以城市青年对住房的刚性需求为出发点，尝试长租公寓这一新的业态。”

作为以服务为宗旨的合作经济组织，上海供销合作社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服务，在上海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进程中作出供销社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华合作时报社）

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之我见

● 苏振锋

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八大关系。

一、处理好现代农业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随着农村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家庭承包经营的弊端逐步显现出来，突出表现为经营规模小、方式粗放、劳动力老龄化、组织化程度低、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因此，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可以有效化解这些新问题，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持续发展。

在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过程中，处理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和家庭承包经营的关系，对两者的协调发展非常重要。一是正确认识传统承包农户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家庭承包经营仍将是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

基础，大量的承包农户会长期存在，我国现有2.6亿多的承包农户，这些承包农户是农业的基本经营单位。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中，每一个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都离不开承包农户的支持，承包农户是其他主体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这些承包农户存在先天不足，抗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力较弱的特点。在我国农业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农业兼业化和农民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快的过程中，传统农户的弱势和不足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也要大力扶持传统承包农户，这是稳定农村大局，发展农村经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二是传统承包农户发展为新型经营主体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新型经营主体与传统承包农户不同，主要从事商品化生产，两者尽管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但更有相互促进的关系。新型主体尤其是龙头企业、合作社，可以为传统承包农户提供生产各环节的服务，推动传统承包农户生产方式的转变。同时随着农村全面改革的推进，承包农户也会逐步成长为家庭农场，小规模农户将逐渐减少，这是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由之路。

二、处理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关系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三大支柱”。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要处理好与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协调发展的关系。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核心是解决农业资源要素配置和农产品供给效率问题。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就是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对农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高农业资源要素配置的效率。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加强生产、加工、储藏、包装、流通、销售各环节的有机结合，提升产业的价值链，通过发展壮大新产业、新业态，发挥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乘数效应，增加适销对路的农产品生产，提高供给效率，进而提高农业质量效益，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提高农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是先进生产手段和生产技术的有机结合，是衡量现代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核心是解决农业的发展动力和生产效率问题。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就是要转变农业要素投入方式，用现代物质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服务农业，用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推进农业发展从粗放生产转到依靠农业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有机组合，是衡量现代农业组织化、社会化程度的主要标志，核心是解决“谁来种地”和经营效益问题。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就是要加大农业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联合与合作，促进农业经营集约化、组织化、规模化、社会化的有机结合。

三、处理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四化”特征之间的关系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四化”特征指的是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四化”

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集约化生产是目标，专业化管理是手段，组织化经营是路径，社会化服务是保障。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中，“四化”虽然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它们相互作用、缺一不可，是支撑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石”。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一定要因地制宜，协同推进，重点突破，整体发展。

四、处理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中各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中，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四大主体。专业大户是指在种植、养殖生产规模上明显大于传统农户，且具有较强经营管理能力的专业化农户。农业部对家庭农场的定义为，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是指以农产品生产、加工或流通为主业，通过合同、合作、股份合作等利益联结方式直接与农户紧密联系，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在规模和经营指标上达到规定标准并经全国农业产业化联席会议认定的农业企业。”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盈利能力最强的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15年平均获利502.82万元。其次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平均获利51.42万元；盈利能力最弱的是家庭农场，平均获利21.38万元。

虽然各大经营主体发展速度不同，盈利能力有所差别，但在实践中并不存在优劣高低之分。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在农业生产发展实

践中承担的角色和定位都不同，其共同存在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之中，是优势互补的整体关系。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是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经营主体，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骨干，是商品农产品特别是大田作物农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是发展合作经营的核心力量；农民合作社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由农户联合与合作组织起来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中坚，是引领家庭经营主体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是联结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桥梁和纽带；农业企业经营是从事农产品运销、储藏、加工发展起来的农业经营方式，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引领，是分散经营有效对接社会化大市场的重要平台，是带动其他经营主体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的核心力量。因此，要针对各类主体的不同特点，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努力形成各类主体互相促进、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五、处理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关系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根本，是农业服务的主要需求方；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农业服务的主要供给方，这两部分有效耦合、相互促进，是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高效运转的关键。一方面，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量越来越大，为社会化服务供给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现代农业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独立的经营主体都不可能包揽所有的生产经营过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了追求稳定的生产方式和利润最大化，即使某些生产环节的服务能够自我提供，由于达不到规模经济要求，他们更愿意接受社会化的生产性服务，如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农产品价格变化、农业生产技术服务、农村金融保险等一系列的社会化服务。另一方面，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变化，及时加大农业服务的有效供给。

六、处理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静态和动态的平衡关系

在现行政策下，通过代耕代种、联耕联种、土地托管、股份合作等方式，推动实现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适度规模经营，使用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可以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如果规模过大，就会带来多方面的负面效应：一是如果规模过大而容纳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又较少，势必出现“失业农民”。二是规模过大容易导致粗放式经营，降低土地产出率。只有适度的土地规模才能实现产量增加和农民增收的统一、才能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发展。

从静态来看，在特定时间内一个区域适度的土地规模是一定的。但从动态来看，适度的土地规模也会不断发展变化，即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正确处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静态和动态的平衡关系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对于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匮乏的我国，改变目前过小的家庭经营规模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一定时间来解决。土地规模经营必须与当地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革新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相适应。二是坚持动态平衡原则。研究建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评价指标体系，引导规模经营健康发展。随着影响土地规模经营因素的改变，适度规模也应随之改变，只有实现动态平衡，才能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

七、处理好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与现代农业人才短缺的关系

在“四化同步”发展过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期趋势。一方面，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加速农村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转移也会制约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从现阶段来看，随着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

进城务工就业，务农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兼业化、老龄化、低文化”的现象十分普遍。很多地方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50岁，文化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主，导致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缺乏人才支撑。由于农村留守劳动力年龄大、文化程度低，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很难得到大面积推广，严重削弱了农业生产发展后劲。破解这一难题的核心就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建设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战略选择和重点工程，是促进城乡统筹、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更是走有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现实选择。

新型职业农民于2012年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将逐渐被现代农业所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也将被新型职业农民所取代。从现代发展的高度看，这不仅是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承载着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职业农民正在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主导力量。随着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和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有效开展，一大批新型职业农民快速成长，一批高素质的青年农民正在成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领办人和农业企业骨干，一批农民工、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科技人员等返乡下乡人员加入到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互联网+现代农业”等新业态催生一批新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正逐步成为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八、处理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在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过程中，正确处

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要明确政府和市场的权利、责任与分工，让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各司其职、相得益彰。一是政府不越位替代市场做决策和选择，即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政府坚决不干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市场不能解决需要政府履职的问题和领域。如，带有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服务，以及相关的法制建设，政府应当起到主导作用，通过深化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有效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满足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持续发展的政策需求。目前，在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过程中，政府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在公共政策方面，给予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更大支持。应尽快出台完善有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工商登记、税收管理等制度性规定，对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设立、组织、运行与内外部关系做出规范等。二是在经营环境方面。要在发展规划、人才培养、信息获取、资金筹措、农业科技创新、物质装备方面给予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更多支持。三是在政策激励方面，针对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发展需求，既需要制定普适性的发展政策，又需要分类建立专门的发展政策。加大财税支持、经济补贴、技术指导和风险控制，积极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持续发展。四是充分发挥各项支农政策无缝对接。梳理相关部门的涉农政策，理顺政策体系，增强各项支农政策之间的衔接性、灵活性、时效性，确保各项支持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的优惠政策落实到位，提高政策实施效率。

（作者单位：陕西省委党校）

加快发展 农业社会化服务

● 金文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小农生产有几千年的历史，“大国小农”是基本国情农情，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业的本源性制度。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足十亩田的小农生产方式，是我国农业发展需要长期面对的现实。家庭经营耕地在30亩以上的农户数量占比不足5%，小农户依然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力军，尤其在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小农户发挥了重要作用。推进农业现代化要高度重视小农户，决不能忽视小农户、排挤小农户。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当前，小农户经营中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了不划算的环节越来越多，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带着小农户干，帮着小农户赚，逐步将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一、生产托管成为引领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的重要实现形式

近年来，各地在积极探索解决“谁来种地”

和“怎么种好地”的过程中，创新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形成了直接服务农户和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比如，江苏的联耕联种、湖北的代耕代种、四川的农业生产共营制、山东的土地托管等。这些模式尽管称谓、形式不同，组织小农户的方式不同，其实质都是在不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前提下，将农业生产中的耕、种、防、收等部分或全部作业环节委托给社会化服务组织完成，统称为农业生产托管。截至2019年底，全国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超过15亿亩次，其中服务粮食作物面积达8.6亿亩次，服务带动小农户超6000万户，占全国农业经营户的30%。农业生产托管成为联结小农户的重要实现形式。

（一）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业生产托管的政策和项目。2017年，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提出把发展农业生产托管作为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带动普通农户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主推服务方式。同

年，中央在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这个大专项中设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重点支持农业生产托管。2019年项目实施省份增加到18个，2020年达29个，生产托管项目资金从40亿元增加到45亿元。农业部办公厅于2017年9月印发了《关于大力推进农业生产托管的指导意见》，对农业生产托管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农财两部于2017年、2019年先后印发《关于支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的通知》，对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实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围绕服务规范化这个中心，农业农村部深入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和行业管理制度的分类研究和编制，以部办公厅文件印发《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和《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标准指引》，大力加强服务标准建设、服务价格指导、服务组织监测和服务合同监管等制度建设。2020年，全国农业生产托管工作推进会在山西召开，总结交流了各地推进农业生产托管的经验做法，在全国上下统一了思想，明确了工作重点和发展路径，推动生产托管加快发展。

（二）探索出一批能复制可推广的生产托管模式。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农作物种植结构和制度不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农民对生产托管的认知程度也不同，发展哪种生产托管模式要因地制宜，总体上要以农民的需求为导向，对于农户经营意愿较强的地区，从单环节、多环节托管入手，对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程度较高的地区，重点推广关键环节综合托管、全程托管等模式。近年来，各地根据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探索出一批成功的模式。例如，河北推广多环节托管、全产业链托管、土地股份合作分红模式和供销社“为农服务中心”等模式；山西翼城创新“政府、企业、保险、农担、期货、银行”六位一体的全周期式生产托管；黑龙江在全省推广“生产托管+金融保险+粮食银行”的“兰西模式”；山东济宁重点发展“服务主体+农户”、“服务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农业订

单+服务主体+生产托管”、“土地股份合作社+服务主体+全程托管”等模式。2019年和2020年，农业农村部先后推出两批44个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对推动全国面上的生产托管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培育出一支多元化专业化的服务主体队伍农业服务专业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服务型企业等多元社会化服务组织竞相发展。截至2019年底，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总量达89.3万个，其中农业生产托管组织超过44万个。从实践看，各类社会化服务主体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农业服务专业户占全国服务主体总量的49.9%，主要为周边小农户服务，最贴近农民；服务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小农户数量最多，达5034.1万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是组织小农户接受服务，提供“居间”服务，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服务型企业服务带动能力最强，单个企业平均服务对象达530个（户），且服务的专业化、集约化和标准化程度较高。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为春耕生产带来了严峻挑战，一大批生产托管服务组织响应号召，积极投入抗疫保春耕的战役，为农民提供“一站式”生产托管服务，减少了农民集中下地作业的防疫风险，实现了农民不下田，服务组织“云春耕”，保障了春耕生产顺利开展。2021年2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组织引导农业服务组织开展生产托管搞好春季农业生产的通知》，要求各地积极组织开展生产托管服务，扎实抓好春季农业生产。

二、深刻认识发展农业生产托管的重要意义

在坚持农村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如何将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是亟需解决的时代难题。早在2014年3月，全国春季农业生产暨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会议在山东济宁汶上县召开，会议代表参观了该县供销社在义桥镇建立的为农服务中心，看到了土地托管给小农户带来的成效，开拓了破解这个难题的思路方法。综合全国各地的实践，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大力推广农业生产托管是解决这一问

题的有效路径，将引爆农业经营方式新一轮变革。如果说，党的全面领导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底色，那么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代表的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就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鲜明亮色。小托管、大服务，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农业生产托管是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丰富和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政策要求。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们党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基于我国基本国情农情确定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泛的适应性，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核心是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这是党在农村政策的基石。发展农业生产托管，不改变集体和农户间的土地承包关系，坚持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保持了土地承包关系稳定，通过为广大小农户提供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实现了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规模化，推动了农业生产经营的标准化、集约化，进而走向现代化。同时，发展农业生产托管为村集体经济组织充分发挥“统”的功能和优势提供了有力抓手，直接服务或组织小农户接受生产托管服务，促进了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这种统分结合的有效实现形式，赋予了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是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大胆探索，是继联产承包后基层干部群众的又一伟大创造。

（二）农业生产托管是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发达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化农业经营形式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纵观世界农业发展，规模化主要靠土地集中实现经营规模扩大。通过社会化服务扩大经营规模也有许多探索，通过合作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一种成功的模式，也是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有效形式，但对中国广大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小农户而言，农民合作社还不能完全解决大量

小农户不想流转土地又要破解生产经营困难的问题。发展农业生产托管，可以通过服务组织的专业化服务，将先进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等要素导入农业生产，切实解决了小农户经营分散、规模狭小、生产效率低、作业成本高、竞争力弱等突出问题，又提高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转变了农业经营方式，促进了农业高质高效发展，为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注入了强大动力。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通过服务组织集中采购、集成技术、标准作业、统一服务、订单收购等，最大限度发挥农业机械装备的作业能力和分工分业专业化服务的效率，有效降低农业物化成本和生产作业成本，实现农业节本、提质、增效。

（三）农业生产托管是社会资本进入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老龄化，农民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强烈，农业生产托管市场潜力巨大。一大批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取得了不凡成绩。中化集团着力打造“MAP”（Modern Agricultural Platform）模式，在全国25个省（区、市）建成128个技术服务中心、292个示范农场，为321万亩耕地提供全程服务。金正大集团着力打造“金丰公社”模式，覆盖全国22个省（区、市），累计服务面积1125万亩。专业类服务企业通过基地建设和订单方式为农户提供全程服务，发挥其服务模式成熟、服务机制灵活、服务手段先进等优势。截至2019年底，全国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中服务公司达3.39万个，服务的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水平较高，且发展势头强劲，发挥着典型引领作用。农业农村部推出的44个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中，有23个为专业性农业服务公司。这些服务公司针对当地产业特点和农户需求，突出市场化导向，有的提供单环节、多环节托管服务，有的将服务领域延伸到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形成全过程、全链条的服务模式。在服务过程中，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采用绿色高效现代农业方式，通过托管服务推动先进生产技术和方式落地，促进农业生产标准化、集

约化和绿色化。

三、“十四五”时期推进农业生产托管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加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农业生产托管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当前，农业生产托管存在着服务主体能力不强、服务领域不宽、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要顺应时代要求，充分认识这一经营形式对创新农业经营方式的重大意义，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准确把握发展规律，切实加大支持力度，大力发展并推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模式，推动农业农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农业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一）加大支持力度。推动出台新阶段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托管的指导意见，适时推动制定《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法》。随着农民群众对生产托管的认识不断加深，各地积极性持续提高，项目实施范围逐步扩大，各地对项目资金的需求将增加。要加强财政资金统筹，加大对生产托管项目资金支持力度，将生产托管项目调整为约束性项目，在项目资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工作经费。进一步加强行业管理，推动服务标准制定，推广使用示范合同文本，加快建立县级社会化服务组织名录库。加强生产托管项目管理，开展绩效评价和监测评估，确保规范实施。

（二）强化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引导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集聚。加快培育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培育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并在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骨干企业，树立行业标杆和服务典型，发挥示范效应。引导农业社会化服务企业加强联合和合作，发展服务联合体、服务联盟等，推动服务链条延伸，打造覆盖全产业链的服务组织体系，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和分

享机制。引导成立行业组织，发挥联系政府、服务会员、行业自律等作用。在财政、税收、用地等方面，探索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优惠政策。

（三）强化金融服务。通过集中连片开展托管服务，可以达到规模经营节约成本的效果。但调研中不少服务主体也反映，实施服务规模经营后，风险也相应集中，特别是开展全程托管的，赚得起亏不起，一旦出现较大的灾害减产，给农户的承诺难以兑现，容易引发社会矛盾。此外，农业生产托管多采取事后付费的方式，在极端天气或者农产品市场价格大幅下降时，由于缺乏对小农户强有力的约束，很有可能面临收不回服务费的问题。此外，服务组织自有资金较少、融资能力弱，贷款难现象普遍，拓展服务力不从心。要强化政银保担合作，鼓励推出以支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为导向的金融保险产品，探索政府部门与银行、保险等机构共同推进托管服务的有效方法。

（四）拓展服务领域。鼓励服务主体拓展服务领域，推动生产托管服务逐步从粮棉油糖等大宗作物向果菜茶等经济作物拓展，从种植业向养殖业等领域推进；由产中向产前、产后环节延伸，提高农产品烘干、保鲜、仓储、冷链和销售等环节的社会化服务水平，逐步提高生产托管在相关产业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覆盖面，有效增强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能力。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充分借鉴生产托管的模式和经验，推动托管模式向农村生活性服务业延伸，发展农村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生活性服务业。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论信用合作的创新

● 陈林

信用合作是乡村振兴的命脉

乡村振兴战略紧锣密鼓，各方面加大投入的同时，仍然存在农村资金持续外流、金融“失血”的局面。商业银行在农村的“存贷差”居高不下，每每成为被指责对象，当其试图深入农村信贷市场又面临重重困难。至于某些金融科技平台，异军突起，但是没有、也不可能自动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其不过是在商业银行“掐尖”（夺走优质客户）之后，再“掐”了一遍。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农村金融仍然是个老大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在体制机制顶层设计上下功夫，鼓励开展农民合作金融试点，建立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金融体系。”中央农办2018年1月2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在浙江的形成与实践》，开篇第一段即把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合作经济作为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探索推进的“一系列农业农村重大改革”的主要代表。浙江瑞安“三位一体”先行试点的重要内容，就是向全国发起组建信合联盟。在合作经济实践中，信用合作（合作金融）长期存在发展短板，又是成功的关键所在。

全世界的农业农村发展但凡较为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大都是以合作经济为主导的，其中包括信用合作的有效运作。欧美多是专业化的信用合作（合作银行）自成体系，例如法国农

业互助信贷银行、德国合作银行都是在本国和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银行。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究其本源仍然属于信用合作，且未必是最佳范例，只是因为所处欠发达国家，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度（容易被人忽略了信用合作的共通性）。亚洲更成功的模式则是多层次、半官方的综合农协（具有公法地位的合作社），内嵌金融功能。如日本农林金库、韩国农协银行、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会信用部，在当地农业农村领域具有绝对优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金融的终极本质，即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千百年来并没有改变，未来也不会变。这在农村金融领域表现得更为直观生动。农民并非没有信用，包括农村的中下层农民都有他们的信用。但是现有的银行体系难以掌握农民的信用，因为信息的不对称，管理半径过长，单位成本过高。要充分发挥乃至放大农村和农民的信用，就必须降低农民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管理运营成本。农村金融中的信用与信息问题、风险与控制问题，需要借助农民组织化特别是新型合作化加以解决，从而促进农村金融深化，并在农村金融深化中有效维护农民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最缺的不是钱，而是组织资源。好比在一个严重水土流失的地方，最缺的不是水，而是植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的枢纽，在于新型信用合作体系，这具有纲举目张的效果。信用合作是乡村振兴的命脉所系，需要在创新中得到发展。

信用合作与社区合作、综合合作的联合

在广义上，信用合作，以及供销合作、各种生产服务合作，都是专业合作的具体形式。专业合作是相对于社区合作而言的，也是相对于综合合作而言的。很多时候社区合作与综合合作是高度同构的。信用合作是贯通各种合作的最佳纽带。

专业合作主要基于“业缘”，其在欧美专业化、规模化农场条件下，得到了长足发展。在业务多元化基础之上，开展综合合作，共享资源与网络，涉及客户对象的高度重合，业务链条的起承转合，便于发挥协同效应和规模优势。好比发达地区“专卖店”居多，欠发达地区“杂货店”普遍。特别是在东亚小农社会，社区长期稳定，社区成员在生产生活上具有较多共同需求，易于形成集体行动，因此，基于“地缘”的社区综合合作更具优势。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属于这种情形，这也是“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重要基础。

在交易量、交易频率不高的情况下，合作金融很难单独存活，因此，更需要实行“三位一体”，与综合合作、社区合作相结合。德国传统上就有一些兼营供销业务的信用合作社，农村地区更多。我国台湾地区的主管部门也批准储蓄互助社可以代办与社员日常生活有关的生活必需品消费业务，这实际上属于供销合作的范围。至于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会与日本、韩国的农协，更是类似“三位一体”，其业务多元化综合运营，内嵌有自己的信用部（银行）。

社区熟人社会，蕴含着丰富的信用信息，特别有利于信用合作。缺乏社区合作，合作经济只能是无本之木；缺乏信用合作，合作经济更是没了源头活水。如果没有综合合作、社区合作、多层次合作作为依托，从经济体量上来说，小农很难维持信用合作；从资金用途来说，也容易发生外流。这样的“信用合作”难免发生异化，沦为另外一种“资本游戏”。

信用合作需要行业管理和政府引导

对于合作经济来说，足够的经济规模与有效的管理半径，是一对矛盾，这需要通过多层次合作体系来解决。具体到信用合作，唯有植根基层社会，才能将合作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也有利于合作成员更多地参与管理。但是，涉及通存通兑、结算清算以及资金调剂、担保增信、品牌推广、审计监督等方面的需要，都需要联合组织的体系支持。否则，基层信用合作是难以为继的。

银监会曾审批成立了40多家农村资金互助社，都很弱小，星散于全国各地，业务过于单一，缺乏社区综合合作的基础，更没有组织体系。诸如联合社、行业协会或联盟组织的支持，实际上是按照银行标准去监管，虽然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是有相当的局限性。

对于信用合作（合作金融）的行业管理除了监管，也应有促进发展的责任。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农村合作金融管理局，1998年更名为“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司”（增加了城市合作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后职能移交，改为银监会合作金融监管部，2015年又改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合作金融之“名”已不存。原有农村信用社纷纷改制为农商行。对于“新型合作金融试点”或“信用合作试点”，则强调“地方政府监管和风险处置责任”。

属地化管理带来的结果就是淡化行业管理。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建立信用合作的多层次（乃至全国性）联合组织，作为行业性自律管理组织，也接受政府委托行使监管职责。这样就同时健全了信用合作的体系支持与行业管理体制。从国际经验看，合作经济的联合组织往往有其特殊地位，有些属于半官方组织。

国外对于合作金融的管理和监督，较多依靠行业自律，因此“联盟”组织不可或缺（政府根据需要也可对“联盟”作出授权、委托）。将来可由区域性“三位一体”合作组织代行监管，探索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合作与联合，逐步统一标准流程和规则体系。协商建立基层

合作和资金互助之上的行业自律机制、限额担保增信机制、品牌连锁机制、审计监督机制。进而在基于互助合作的互联网金融和区块链应用上取得新突破。

对于小农合作而言，在规模化、市场化、专业化程度较低条件下，要取得规模优势，就必须在业务品种上更加综合，在人数范围上更大联合，由于基层合作的有效半径很难超过熟人社会，大合作要借助多层次合作来实现，以此达到合作的规模经济。即便小农的市场化、专业化程度有所提高，仍然很难达到小农合作的经济规模。由于单个小农的预期合作收益有限，而达到经济规模所要求的合作成员数又较多，故而小农的大规模合作难以自发产生。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小农合作都是官方大力主导，有特别法保障，具有公法地位和某些特许权。

信用合作以信息为前提和保证

信用合作首先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机制，不一定要形成实体的组织机构，也无须以金融牌照为先决条件。金融的本质是信用，信用的本质是信息。如果可以通过组织化的方式降低农民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有助于提升农民的信用，这其实是一个金融过程，但并不依赖真金白银。

合作经济组织植根基层，开展征信评级、小组联保和反担保增信，可以充当银行的助贷机构，这已经具有信用合作的内涵。如果进一步开展内部资金互助，可由银行全流程托管，从银行角度理解作为一种“委贷”（委托贷款），即某个、某几个成员将自有资金委托银行贷款给另一个成员。以上两种情况均不会在银行体外形成“资金池”，尽量把资金流以及相应的账户、支付、结算留在银行体系运转，避免了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并以此化解金融风险的隐患，克服长期以来信用合作难以规范、难以复制和推广的困难。

从理论上说，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人群中，轮番开展互助委托贷款，经常调剂资金余缺，同样可以达到类似合作金融的效果，而不涉及

机构、牌照等问题，只作为银行正常经营的一款产品设计。

金融科技赋能信用合作

传统意义上的合作金融都是资金池模式，国外更已形成发达的合作银行体系。资金池模式本来是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的（但是提高了监管成本）。正如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组织（当然也包括金融机构）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是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可以将组织机构还原为契约，将复杂契约还原为简单契约的叠加，其中必然涉及交易成本的上升。

2017年复旦大学首届博士后创新创业项目“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系统集成”，提出了基于区块链的信合联盟数字化架构方案。关于“三位一体”、“数字化”、“系统集成”的提法也为2020年4月发布的《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实施办法》所采用。中国建设银行已在若干省份开展相关项目的实施。通过合作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限额联保，发现和增进农村信用，并引入反担保措施盘活抵押物资源，创新合作经济互助增信贷款、互助委托贷款，便利于和让利于农民，可以达到类似合作金融的效果。引导农村资金及其收益留在当地“内循环”、“微循环”。同时去除了资金池风险，更加安全稳健，容易得到政府和农民认可，也为银行业务发展打开广阔空间。发挥金融科技优势，研发基于合作经济原理的系统集成平台，可以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和信用链，同时促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商业银行与合作金融组织的配合

习近平总书记很早就《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中提出：“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农村各类金融组织，尽快形成国家政策银行、商业银行、合作金融组织相互配套、竞争有序、严格管理的农村金融体系”他特别指出：“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要充分发挥合作金融、商业金融各自的优势，做到合理布局、分工协作、优势互补”。

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银行，（下转第27页）

「大力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

● 戴相龙

从2004年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恢复下发有关“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采取多项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其中包括积极推进农民合作组织的立法工作，发展农村合作经济。2007年7月，国家公布《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此后，中央1号文件多次提出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应运而生。

新型农村合作经济是指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公布后发展的，实行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综合发展的合作经济。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具有三项功能。一是及时方便服务社员的功能，二是收益返还功能，三是促进合作经济组织多层次联合的功能。这是其他农村经济组织不能代替的。

2006年，浙江省瑞安市组建了由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参加的“农村合作协会”，后改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简称“农合联”。对这项改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给予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中发（2017）1号文件提出：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是促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2020年，我国已完成脱贫攻坚战的任

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到2035年要实现“人民生活更为宽裕”的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一条途径，就是增加约2亿农户的家庭经营收入。笔者在调研中看到，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年收入比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一般高出30%左右。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利润约13000亿元，近几年农村商业银行、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年均利润约2500亿元。通过“三位一体”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可将一部分农产品加工利润和商业银行利润转移到农户。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向乡镇集中，有利于推进新兴小城镇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2019年7月，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有220多万家，是2010年的4.8倍，10年来年均增长19.3%。合作社对扩大规模经营、增加社员收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空壳社”比例也不小。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该由农民专业户自愿组成，可以跨村、跨乡建立，要有一定的发展规模。对验收合格的合作社，政府给予一定补贴，不合格的应促其自我完善。单一农民专业合作社，一般情况下收益较低，要支持有一定规模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农产品加工和资金互助，扩大合作社的收益。

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开展农产品加工、运输、储藏等服务。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组建农产品加工合作社，在乡镇开展农产品粗加工。畜禽产量大的，可在县城或畜禽生产基地创建合作社性质的现代畜禽产品加工厂。吸收民间资本作为加工合作社的优先股，聘请职业经理和专业人员经营管理加工合作社。在农牧产品加工合作社内设销售部，建立食品销售网络和大宗食品交易中心。逐步改变畜禽产品生产在当地，屠宰和加工在远方大城市，社会资本获取产业链大部分利润的不合理状况，逐步形成以国家扶持、合作经济组织为主体、利益主要返还农牧民的农牧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管理体制。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互助

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考虑到原有农村信用社已演变为商业银行，中央从2008年开始至今，已10多次提出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的主要形式，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互助。这种信用合作要坚持会员制、封闭性、不向社会吸储放贷、不承担固定回报的原则；不设独立法人，由农民专业合作社内设的“合作部”承办；社员可以不入股，可从社员首次借款中提取一部分风险准备金；存款和借款利率按当地农村商业银行执行；存贷业务可以委托当地农村商业银行办理。过去的农村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已向社会办理业务，对其纳税是必要的，建议对信用合作形成的收益不纳税，按社员缴存的风险准备金和存款、借款积分返还社员。加强各级政府督管理，及时防范和化解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

依托各级政府成立多层次农民专业合作社

协会或联合社，简称“农合联”。鉴于原农村信用合作社已演变为商业银行，大部分乡镇供销社已经退出或只是挂名，已很难成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协会”。因此，要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会或联合社，附设供销合作、信用合作分会。“农合联”主要功能是对社员提供生产、供销、信用合作综合服务，加强自律，发挥合作社与当地政府的纽带作用。县级“农合联”不能虚设，要设立专职理事长和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近期，县（市）“农合联”理事长可由一位不在政府任职的副县级领导干部担任，逐步过渡到由社员大会选举。建议理事长及工作人员薪酬，由县财政适当补贴，不足部分今后可从信用合作收益中按一定比例提取。

加强党和政府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的统一领导

凡涉及城乡居民的改革，都必须依靠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要吸取过去大搞“合作化”的教训，对农民组织合作不能包办代替。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符合农民根本利益，要充分调动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的积极性。但是，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只提“提倡”“引导”“支持”还是不够的。县级党委和政府要对农民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应承担领导责任。编制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发展规划，制定扶持政策，培养典型，逐步推广。建议省级政府逐步设立农村合作经济干部管理学院，有关省辖市逐步设立合作经济经营管理培训中心，为县乡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培养党政领导干部和农民合作社的理事长、主任。鼓励大学毕业生，特别是农科大学毕业生到农民合作社任职创业。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成员、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原组长）

传统菜市场转型的思考

● 许勇

“互联网+”时代，人们买菜做饭有了多种全新的选择，但传统的菜市场仍然必不可少，它的“烟火气”能让人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个城市温度。市场的环境是否整洁有序，经营是否诚实守信，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购物体验，也彰显出市场管理服务的水平。尽管菜市场是市民日常购物的重要场所之一，是建设优质“菜篮子”工程的重要切入点，但农贸市场传统的经营模式正经着生鲜超市等现代商业业态的冲击，消费者以及租赁商户对农贸市场设施、布局、环境、管理水平、服务意识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笔者所在的云集公司是松江供销社旗下的市场管理运营企业，肩负着管理松江区菜市场的重任，正面临着这一系列的挑战。

一、制约云集市场发展的因素

菜市场相对于方兴未艾的生鲜电商是一种传统的商业业态，存在很多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就云集公司而言，当前主要有6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一) 基础设施陈旧。菜场建设年限已久，建筑物陈旧，摊档设施破损严重；现有的水电和排污等设施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经营的需要，成为了影响市场运营的关键因素。

(二) 市场品类配置和布局不合理。很多

菜场自从建立以来，其品类配置和布局一成不变，很少根据市场消费环境变化而进行有效的调整，经济效益低下。

(三) 收益低。菜市场的经营收入主要以租金为主，然而菜场的公益性质决定了租金的提升空间十分有限，因此，仅靠租金收入市场经营规模难以扩大。

(四) 缺乏发展后劲。农贸市场的个体经营户的收入没有稳定保障，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许多人因此改行，从业人员青黄不接，经营户逐年减少，市场逐步萎缩。

(五) 竞争加剧。新型商业业态分流客源。面对大型超市、购物广场、连锁专卖店、生鲜超市以及电商等业态和经营模式的冲击，菜市场难有招架之势。

(六) 缺乏人才制约发展。由于缺乏人才，市场在缺乏战略性发展规划的同时，也难以正确理解和落实发展措施，缺乏执行力。

基于这些制约因素，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建设智慧菜场任重道远。为此，亟需创新和求变，抛弃保守、凝固、夕阳的思维，

二、一手抓设施建设，一手创新经营理念

自2013年起，云集公司对菜花泾、方塔、

人乐、佘山、天马等菜市场开展了升级改造，推动了菜市场向智能化、时尚化、年轻化转变，改变了往日农贸市场给人“脏乱差”的印象。

（一）实施“三知道”管理措施。一是“早知道”。每天清早对所有进入市场的农副产品进行溯源管理。二是“马上知道”。抽样检测，对不合格的农产品第一时间采取食品安全应急预案；三是“全知道”。所有商户的个人身份信息必须做到“一户一档”，每天对市场实时运营情况的全面了解。同时，还通过“你点我检”服务，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免费为他们所指定的农产品进行快速检测，让居民放心购买。

（二）构建长效管理机制。“窗明几净、整洁有序、菜品种类丰富、管理规范、配套设施齐全，菜花泾农贸市场到底是‘国’字号的绿色农贸市场”，这是2020年1月23日区市场监督局局长陆峰带队一行6人前往菜花泾农贸市场检查指导工作时的评价。菜花泾农贸市场是这样，云集公司所辖的方塔、人乐、新桥、车墩等农贸市场也同样深受附近居民的欢迎。

长效管理的关键在制度，公司在着力抓好管理责任制基础上对市场提出了抓“五面”的长效农贸管理机制，促进市场全方位综合性升级改造。一看“门面”企业形象；二看“地面”整洁干净；三看“墙面”无乱贴乱挂；四看“台面”整洁卫生；五看“人面”微笑诚信。

（三）落实星级菜市场规范化管理

眼下正是移动支付和电商的时代，无论是农贸市场还是大型农贸超市，正逐步与之接轨。菜市场内的不少经营户也把所经营的部分商品转移到了线上。为此，我们也与时俱进，探索互联网+模式，与本地电商平台进行合作，定期组织商户进行电商培训，推进“电商+店商”运营模式，实行线上与线下融合。同时注重科学管理和品牌建设，组建了一支专业的督导管

理团队，严格按照星级菜市场规范化标准进行管理，先后制定了《农贸市场经营者管理办法》《农贸市场商品准入制度》《市场文明经商公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从制度上保障市场的经营秩序、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全力为消费者创造良好的购物环境。

三、调整业态配置和布局

农贸市场的经营创新，需要整体设计。根据所处社区的实际需求，对每个市场的业态配置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通过持续的调整来提高效益，解除一部分制约云集公司发展的因素。

2020年下半年，云集公司对车墩、新桥菜市场实施整体租赁，原来不尽如人意的经济效益通过此举有了一定增长。2021年对这家租赁的菜市场进行标准化智慧菜市场升级改造。全面提升市场形象，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城市的菜市场仍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从长远看，随着人们消费需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菜市场必须随之升级、转型，否则，退出历史舞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菜市场的升级改造也“一直在路上”。比如建设新型街市、智慧菜场等。近期，云集公司启动了对招商农贸市场的智慧菜市场试点建设，系统提升菜市场经营管理水平和保供能力，更好实现主副食品供应量足价稳、优质安全、便利惠民。达到市场管理提效、商户降本增收、政府运行调控、消费者体验升级，依托数字化赋能，进一步推进标准化菜市场提质升级。

作为松江区供销社所属的市场管理公司，云集公司坚持以“党建强、贸易强”为指引，以党建引领市场和谐发展。统筹兼顾、持续发力，根据“十四五”发展新要求和松江区的实际，写好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管理这篇“民生文章”。

（作者单位：上海市松江区供销合作社）

探索农村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新模式

● 上海再生资源行业协会

近几年的农村市场，一直是各个家电企业竞争的主战场。相比一、二级市场，农村市场新增需求较大，在第一轮家电下乡，节能惠民等政策实施下购买的家电将迎来换新高潮。

农村市场的家电产品销量快速上升，意味着每年都将会产生大量的废旧家电。这些废旧家电该如何处置？供销合作总社经济发展与改革部产业发展处处长王湛表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与农村环卫清运网络两网融合为系统内外推进农村废旧家电回收提供了一种更新、更成熟、更高效的模式，既充分利用了网络资源，拓宽了回收渠道，又规范了回收流程，提高了回收效率，为做大农村废旧家电回收业务夯实了基础，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一、农村废旧家电退休难

面对“废旧家电如何处置”的问题，消费者大多认为能修就行，修不了的家电就扔在院子里，或低价卖给收废品的商贩。至于废旧家电的最终去向，大家都不关心。

供销合作社长期扎根农村，服务农民，点多面广，是我国农村商品流通的一支骨干力量。在农村废旧家电回收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可或缺。近年来供销合作社流通网络覆盖面不断扩大，流通基础设施条件逐步完善，流通效率和运营水平大幅提升，在农村现代流通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显现。截至 2020 年底，供销合作社全系统连锁企业 6697 家，拥有配送

中心 10802 个，发展连锁、配送网点 83.2 万个。其中，直营连锁、配送网点 15.5 万个，加盟连锁、配送网点 67.7 万个。县及县以下连锁、配送网点 78.1 万个。各地供销合作社积极行动，不断拓宽业务领域和经营范围，不断加大废旧家电回收处理力度，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目前，供销合作社系统在超过 20 个省份开展废旧家电回收处理工作，拥有从业企业 360 余家，年回收处理废旧家电数量约 2500 万台（套）。作为总社直属企业的中再生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完善、稳定和优质的废旧家电回收网络，年回收拆解量超过 2000 万台（套）。

二、完善农村逆向物流体系

农村废旧家电回收体系的关键在于完善农村逆向物流体系。积极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与环卫清运网络有效对接，实现“两网融合”，这是供销合作社在完善逆向物流，健全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方面的有效探索。

目前各地供销合作社通过积极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依托现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与农村环卫网络，发展符合城乡建设发展规划要求，布局合理、网络健全、设施适用、服务功能齐全、管理科学的“两网融合”示范网点，在机制、人员、物流、设施、平台等方面实现“一网多用”，有效提高了农村废旧家电回收效率。

三、探索农村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新模式

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和日用消费商贸连锁网络的优势，探索构建具有供销合作社特点的家电销售和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新模式，力争到 2022 年系统处理废旧家电能力占社会总量的 1/3。

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和基数双双高企，是消费市场的潜力股。随着农民群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的持续加快，农村地区将会释放巨量的消费需求。为此，供销合作社拟从以下五个方面予以推进。

第一，发挥日用消费品流通优势，促进家电更新消费。鼓励系统内商场、超市、电商平台等经营企业加强家电消费升级引导，激发消费潜力。开展多种形式的家电促销活动，引导城乡广大消费者按安全使用年限更新家电，推动农村家电消费产品换代。

第二，发挥经营服务网络优势，健全优化废旧家电回收渠道。利用系统遍布城乡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积极拓展废旧家电回收业务，规范回收流程。推动家电回收企业构建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回收模式，并积极与家电生产企业开展合作，建设多元回收渠道。

第三，发挥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优势，提升废旧家电处理利用能力。鼓励系统内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提升废旧家电拆解利用能力，提高废旧家电处理的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加强无害化、高值化利用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提高处理产物附加值。发挥系统龙头企业技术和资质优势，加强系统内外再生资源利用企业的合作，提升废旧家电拆解处理能力。

第四，加强技术标准规范和物流体系建设，推动产业提档升级。在废旧家电回收处理环节，强化行业技术标准规范建设。健全家电销售、回收和处理各环节物流体系建设。利用销售环节配送、装机、维修等渠道，发展逆向物流。进一步降低废旧家电收运和存储成本，提高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效率。

第五，充分发挥系统内各级再生资源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履行行业自律、技术交流和反映诉求等职能。加快制定行业标准，组织专业技能培训，引导企业规范经营，总结推广行业典型经验做法，促进废旧家电回收处理行业管理水平提升。做好行业诚信建设，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行业健康规范发展。

.....

（上接第 21 页）囿于传统的体制机制，难以持久深入农村特别是基层，这是历史经验和各国实践一再证明了的。合作金融，有利于确保农民主体地位，具有草根优势，但是过于分散、弱小，容易成为监管盲区。

要超越合作金融传统模式，探索新型信用合作体系，完成“三位一体”的金融构造。专注于信用本身，尽量把资金流、资金池以及相应的账户、支付、结算等留在银行体系运转。在发挥银行优势特别是金融科技优势，嫁接信用合作机制，在信贷和支付结算等业务上都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并预言：“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

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合作经济包括信用合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农村领域更有广泛应用前景

《宪法》第八条已明确了合作经济包括信用合作的地位，因此构成公民特别是农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各级政府的责任是保障这些权利的顺利行使。发展信用合作，是真正在金融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效的信用合作，不仅意味着资金及其收益在当地“内循环”、“微循环”，还将持续积累互信，有助于不断改善社会治理，促进共同富裕。对于乡村振兴来说，更是命脉所系，因此要理直气壮高举信用合作的旗帜，坚持信用合作的创新方向。

（作者系中国信合联盟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小农的现代化模式

——读董正华《走向现代的小农：历史的视角与东亚的经验》

● 葛志华

从世界范围来看，农业的两大基本要素：土地与劳动力的结合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基于人多地少而形成的东亚精耕细作的小农模式；一类是源于地多人少而生成的美国式大农模式。资源禀赋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与美国不同，东亚自古以来人口众多，人地关系比较紧张，有农民小块土地精耕细作的传统。据《走向现代的小农》披露，近代以来，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人均耕地只有 0.1 公顷，户均耕地 1 公顷左右，人地比例属世界最高之列。1909 年，美国学者富兰克林·H·金实地考察了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农耕体系，写下了《四千年农夫》。作者真实地记载了东亚小农模式：“东亚民族的农业在几世纪之前就已经能够支撑起高密度的人口。……几乎每一寸土地都用来种植作物，以提供食品、燃料与织物。”

二战结束后，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都面临着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工业化。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两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一是实施农地改革，废除了殖民时代遗留下来半封建土地制度，确立了平均地权基础上的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现代小农制度；二是推进农会改革，建立起统一的、以小农为主体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使之成为

农民增强政策影响力、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组织形式。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大力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实现了现代化，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农业不再封闭，与整个国民经济连为一体，成为现代化的基础支撑。这突出表现在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工业化对农业的改造两方面。

就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而言，正如 197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所言，主要贡献包括产品贡献（提供食品与原料）、市场贡献（国内市场份额）、要素贡献（要素资源由农村流向城市）、以及外汇贡献（农产品出口换汇为平衡外贸收支的重要作用）等。资料显示，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占 85% 以上，六十年代仍占 50%。土改与农会改革推动了农业发展，为工业成长提供了动力，也为中国台湾地区经济腾飞，跻身“四小龙”行列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小农的贡献、农业的高速增长，成为工业化的源头活水。

农业对工业化的四大贡献，既是后发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也是农业增长与农村发展的内在需要。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又反过来成为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拉动力量。这种拉动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工业化为农业提供了技术支持。农业机械与化肥农药，既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又扩大了农民与外界的联系，拓宽了农民视野，引起了农民价值观念的变化，在减少农民数量的同时提高了农民素质。二是由工业集聚而形成的城镇又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既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提升了城市化水平，又改变了农村人地关系，让更少的人耕种更多的土地，逐渐形成了有效率的农业经营体系。三是现代农业的发展又为整个国家提供了农产品、生产资料，保障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稳定。没有工业化的拉力，农业现代化就会失去动力。

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实践表明，东亚的小农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既适合传统农业，也适合现代农业。当然，现代农业不同于传统农业，当代小农有别于传统农户，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更有质的区别，东亚小农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离不开政策导向、组织、现代要素三大因素。

就政策导向而言，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适时调整工农关系，由“挤压农业”转向“扶持农业”，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再到重化工业这三个阶段，大致十年转换一个阶段。在现代化早期，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大多采用以农育工、以乡补城的方针，通过税赋、剪刀差、“肥料换名”制度等多种形式，从农业汲取剩余推进工业化。中国台湾地区学者称之为“发展的榨取”。随着工业化的升级，农业的弱质性不断显现，在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收率等方面的劣势不断显现，资本、土地、劳动力三要素净流出，“三农”问题越发严重。随着工业化的深入，非农部门不断扩大，农业从业者日渐减少，兼业农民不断增多，“农业危机”时隐时现，主要表现为食品自给率下降、城乡收入失衡、农业粗放经营等。因此，适当调整城乡关系，由“挤

压”转向“扶持”，成为农业持续发展的必需，是维持农村稳定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制订了《农业农村发展条例》，推出了“加速农业建设九项措施”来调整工农关系，政策导向由“挤压农业”向“扶持农业”转变。主要内容有降低农业赋税与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与信贷、拓宽农会功能，扩大农户经营面积，加速推进农业机械化。资料显示：1972—1976年，韩国农业投资额较1967—1971年增长了四倍，中国台湾地区也适时废除“肥料换谷”制度。此后，又根据形势需要，不断增加农业投资与各项补贴，实施以工补农政策，推进农业农村发展，中国台湾地区的“精致农业”、韩国的“新村运动”应运而生，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就组织层面而言，重视发挥合作经济组织的独特优势，增加小农的政策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政府的政策调整与农民的自身合作相辅相成。政策的扶持增强了农民合作的能力，而农民合作又使政府扶持更有效。农地改革与农会改革相辅相成。农地改革使地权分散化，调动了农户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而农会改革又把分散的小农聚拢起来，将土改以后自耕农为主体的农耕社会连续成一个上下垂直沟通的组织化网络。前者是解决地权分配，以“安定社会”为目的，后者则是解决“经营管理”，以“提高收入”为目的；前者将土地“化整为零”，打破“大地主、小佃农”的格局，后者又将土地“化零为整”，造成“小地主，大佃农”格局。无论是韩国农协，还是中国台湾地区农会，都具有沟通、服务、控制等多方面功能，是联系农户与市场、农户与政府的桥梁与纽带。农协或农会的存在与发展，对政府而言，多了一个落实农业政策的辅助机构，对市场而言，多了一只“看得见的手”，缓解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对农户而言，则有了一个可以依赖的服务组织，实现了专业化分工与规模化经营，既调动了农户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又弥补了小农经营的困境与缺陷，实现了农业（下转第33页）

关于创建上海市离休干部 示范党支部的思考

● 顾雪莹

离休干部党建工作是老干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离休干部党建工作，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论述，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始终把政治引领作为老干部工作的生命线，发挥离休干部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把广大老同志思想统一起来，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念，永葆革命本色。本文拟就上海市供销综合商社创建上海市离休干部示范党支部作如下思考。

一、2020年离休干部党支部工作开展的情况

（一）离休干部党支部基层组织建设

在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领导下，上海市供销综合商社管理中心党总支关怀下，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强化政治建设在老干部工作中的统领地位和作用，有效组织引导老同志坚定不移服从服务于供销社中心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1. 支部班子配备有力。由于离休老党员平均年龄92.5岁，为保证党支部工作的正常运转，党支部每三年换届选举一次，2020年党支部换届改选，党支部委员工作明确分工，认真履职尽责，主动向管理中心党总支汇报年度工作计划，积极推进年度工作进度，做好年度工作总结。

2. 学习教育严谨扎实。教育引导老党员始终牢记党员身份，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自觉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党支部安排送学上门，慰问了9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和6位抗战时期的老同志。

3. 认真落实“三会一课”。每月召开一次党支部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一次支部党员大会。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突出政治学习教育，突出党性锻炼，以“两学一做”为主要内容，结合离休干部党员思想和生活实际，确定主题和具体方式，做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氛围庄重。

4. 学习教育方式丰富有效。积极创新学习教育方式，通过智能APP、上海老干部APP、微信公众号、离休干部群等形式，提高学习的针对性、及时性和有效性。2020年建党99周年之际，邀请抗战离休老同志为管理中心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上了一堂《红色传承，淬炼初心“四史”学习教育》现场党课；抗日战争纪念日“9.18”当天，邀请离休干部郑静、邬阿富、曾少华三位离休老同志为管理中心干部职工上了一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革命传统教育

党课。2020年11月邀请部分离休干部代表参加“庆祝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成立70周年”座谈会，听取市社党委书记程颖、市社主任张华对上海供销社改革成果汇报，参观了上海供销大厦，共享上海市供销合作社的改革成果。

5. 党支部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2020年初新冠肺炎在湖北武汉流行时，离休干部党支部积极响应党中央、习总书记的倡议，离休党员干部捐款金额达到76800元。党支部书记邬阿富同志每当国家遇到重大自然灾害时都带头捐款捐物，捐款金额累计达到12万元。2020年底他因意外突然离世，没有给家人留下片言只语。然而在生前曾嘱咐子女一定要向党组织缴纳最后一笔党费五万元。邬阿富同志把理想信念化为实际行动，彰显了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担当作为的优秀品格，他的先进事迹在上海市老干部网站、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网站广泛宣传，充分发挥先进典型辐射带动作用。

（二）离休干部党支部建设存在的问题

管理中心现有离休干部23人，其中16人是党员；年龄都在80岁以上，百岁以上离休干部有3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离休干部整体进入“双高期”，活动范围、活动能力、活动形式受到限制，离休干部党支部建设面临工作弱化、作用弱化等新情况。

1. 离休干部党支部组织建设问题。从班子建设看，由于离休干部党组织没有“后继队伍”的要求，又存在年龄大、健康状况下降等原因，支部班子成员的选择面将会越来越窄。对加强党支部班子的建设带来一定困难，党员学习和组织生活不能得到较好地落实。

2. 老干部年龄大、患病多，出勤率低。在党支部建设工作中，离休干部年龄普遍增高，健康状况逐年下降，不少人长年有病、行动不便，不能参加组织活动的老干部人数逐年增加，有时影响了党内组织活动的开展。

3. 抓支部建设和党员思想工作投入精力少，缺乏有效的工作管理机制。有的因原企业改制或易地安置而没有将党组织纳入管理，有的甚至只交党费，缺乏组织生活和学习机制，

工作陷于被动。

（三）离休干部党支部建设努力的方向

今年正值庆祝建党一百周年，要进一步提高离休干部的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充分发挥广大老同志的独特优势和作用。深刻认识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与发挥离休干部优势特长的内在联系，牢记尊重老干部就是尊重党的光荣历史。以建党百年为契机，努力开创新时代离休干部党支部工作新局面。

1. 加强政治引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抓好基层基础建设，用好线上线下平台和基地，研究制订加强离休干部党建实施意见，不断提高支部建设的质量。

2. 围绕庆祝建党百年主题活动，通过精心组织离休干部支部系列活动，走访慰问老同志等形式，努力形成整体性筹划、集体性安排和协同性推进，充分展现老干部工作特色和亮点。

3. 弘扬正能量，引导更多老同志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发挥独特优势和作用，组织和动员更多离休干部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为人民城市建设添砖加瓦。

4. 着力精准高效，提高离休干部服务保障水平，充分运用相关的公共资源、社会服务及市场化服务平台，做好关心帮扶，把党的关怀送到老同志心坎上。

二、积极创建2021年度上海市离休干部示范党支部

老干部工作承载着党和国家关心爱护老干部的重要任务，从本质上讲是党建工作，从根本上说是政治工作。离休干部整体进入“双高期”，完善党支部基层组织建设，铸强支部班子、强化教育管理、创建支部品牌、完善关爱机制、加强保障措施，是创建上海离休干部示范支部重点思考、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通过充分发挥离休干部的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高质量的工作成效，扎实的党建成果，积极创建离休干部示范党支部。

（一）铸强支部班子

1. 政治建设过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and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决执行上级党组织和本支部决议，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 班子配备有力。支部书记和副书记相继意外离世不久，2021 年 2 月重新选配了两名党性强、威信高、履职能力强的离休党员干部曾少华、姜瑞芳，分别担任离休干部支部的书记和副书记，管理中心党群办张怀青担任支部委员。新一届党支部以“政治功能更强化、教育管理更有力、组织设置更优化、制度建设更完善、作用发挥更有效”为目标，积极开展标准化党支部创建活动，切实把离休干部党支部打造成统一老干部思想、凝聚老干部力量的主阵地。

3. 工作落实到位。定期召开支委会，坚持民主集中制，重大事项由党支部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定期向管理中心党总支汇报党支部工作情况。积极发挥离休干部“上情下传，下情上达”的桥梁纽带作用，定期上门听取离休老党员提出的各种建议，不断改进工作方法，认真完成各项任务。

（二）强化教育管理

1. 学习教育安排合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育引导党员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用党章党纪党规规范自己的言行，不信谣、不传谣、不发表不负责任、有损党的形象言论，不参加各种封建迷信活动。每月 15 日为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开展学习教育，并定期在工作群安排落实中央和市政府相关政策、会议精神等阅读文件，通报市社和管理中心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情况。

2. 严格开展组织生活。按照上级统一安排，结合本支部实际每年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民

主评议党员。以“展示阳光心态、体验美好生活、畅谈发展变化”为主要内容，开展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的组织生活案例分享。结合老干部身体状况和心理特点开展组织生活，增强其对党组织的归属感，永葆共产党员本色，离岗不离党，增强离休干部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3. 规范执行各项制度。要做好督促指导工作，切实用制度促进老干部党建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按照《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规定》，有效落实会议制度、党日制度、党课制度、报告工作制度、民主生活制度、党员汇报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使离休党员都能及时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

（三）创建支部品牌

1. 认真组织开展正能量活动。一个支部就是一座战斗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离休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员本色，传递正能量，点亮最美夕阳红。邀请离休老同志在政治节日和重大政治活动期间为大家上党课，对青少年、团组织、党组织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组织部分离休党员干部参加观看电影，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相同的过往经历，不断强化党员们“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的历史担当。

2. 积极融入社区服务基层建设。离休干部党支部的党员主动亮身份、树形象、做表率，积极参加社区共建活动，主动建言献策。以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姿态主动担当作为，争当志愿者，为所在社区服务。积极参与社区“绿色环保行动”。参加社区微信平台“传承红色基因，追寻初心使命”活动，语音分享入党故事，回顾入党时的初心和使命和庄严承诺，进一步厚植离休党员干部“一句誓言，一生作答”的信仰和情怀。

3. 选树宣传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凸显老同志示范引领、服务社会的政治优势。在围绕中心、搭建平台、设计载体上多做文章，积极宣传老同志的先进事迹，建立健全激励保障机制，让老同志在服务社会的活动中有所作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辐射带动作用。

（四）完善关爱机制

1. 及时做好思想工作。针对支部内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党员，经离休干部党支部同意，由支部委员张怀青主动做好送学上门工作，通报支部学习情况。建立联系党员制度，党支部委员之间、党支部委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之间，实施经常性谈话制度。对不明原因缺席集体活动的党员作电话询访。通过党支部送学上门、节日走访慰问，及时了解掌握党员的思想、家庭和身体状况，解疑释惑，做好思想工作。

2. 严格党员管理。认真做好组织关系转移和接收工作。做好流动党员管理，认真排查是否有长期居住在国外或国内异地养老的党员，对国内异地养老的离休党员保持经常电话联系，年度定期走访慰问并收缴党费。对患有重病、家庭困难的离休党员干部，经离休干部党支部同意，适度减免党费。每年离休支部党费由管理中心财务部指定专人保管，每年在支部党员大会通报党费使用情况。

3. 积极开展党内关怀。每年年初更新完善三张表格：80 周岁以上人员状况表、50 年以上党龄登记表和重病困难人员登记表。对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和出现重大困难、身心健康存在突出问题的党员，及时安排专人上门排忧解难。

在元旦、春节、端午节、“七一党的生日”、“十一国庆节”、重阳节等节日进行走访慰问，对生活困难的离休老同志及离休遗孀进行生活帮困，切实把党的温暖、组织的关怀送到他们心坎里。

（五）加强保障措施

1. 配备学习活动场所。目前管理中心根据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实际情况，设置与党员数量匹配的党员学习活动场所，满足离退休干部党员开展学习活动的需要。活动场所设置“老党员共享家园”标识，设置党务公开、规章制度和政策宣传专栏，并配备必要设施设备。

2. 保障经费和补贴。按照党的规章制度对离休干部党支部进行管理，建立党建台账和党员基本信息表。离休干部支部缴纳的党费全额下拨，用于离休干部支部党建工作，落实离休支部正、副书记工作补贴。

3. 加强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党建 APP、微信公众号等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离休干部党支部智慧党建，把支部建到网上、把党员连在线上，鼓励党员参与网络宣传，用积极的声音引导网络舆论。

（作者单位：上海市供销综合商社管理中心）

（上接第 29 页）现代化。

就农户层面而言，用现代要素改造传统小农。在 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看来，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入现代要素。规模狭小的单个农户无法引入现代要素，必须依托一个多功能合作组织来连结资金、技术、市场等。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在不损害农户经营产权的基础上，配合农村公共政策的调整与支持，整合小农生产与销售环节，通过资金、技术、市场信息等要素资源，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增加了农民收入，解决了一家一户农户“干不了、干不好、干得不经济”的问题，实现了专业化分工与规模化经营。韩国农协把

分散的小农户联合起来，统一加工、统一分级包装、统一品质划分、协调技术服务与信贷支持，用现代要素改造传统农业，使土地在小农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实现了专业化分工与规模化经营，农协也因此成为农业经营模式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成为农业横向与纵向一体化的核心制度安排。通过农协向社员提供信息、信贷、技术、培训、市场开发等全方面的服务，小农逐渐走上现代农业轨道，成为工业社会的农业从业者。

大国小农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把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是历史重任。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与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供销合作社）

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强化思想政治工作

● 谭利辉

党史学习教育既是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也是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上海奉贤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发公司”）党委自今年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以来，坚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同总结经验、关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并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办实事、开新局的强大动力和智慧经验，为实现经发公司“十四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一、总体情况

（一）统一思想，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抓在经常、融入日常。

1. 认真落实党委主体责任。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经发公司党委书记任领导小组组长，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任副组长，统筹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坚持每月召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听取专题汇报，研究阶段性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成立综合协调组、材料宣传组和实践活动组。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明确党史学习教育的总体要求、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进度安排。研究制定《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案》，把党史学习教育列入党委年度工作计划，制定阶段性学习计划，并将党史学习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情况纳入对基层党支部党建工作考核内容。

2. 认真部署学习内容。采用党委中心组学习、专题读书班、专题辅导报告会等形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对上海工作、国资国企和供销合作社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深入研读《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等指定学习材料，用好《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等参考资料，多次开展集体学习和交流。深入学习《党章》，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专题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3. 认真做好督导工作。成立由党政领导班子带队的7个党史学习教育督导组，做好巡回指导和督导工作。建立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加强对基层党支部的调研指导。结合建党100周年，公司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到联系点为党员上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重点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心得体会，进一步增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各基层党支部结合实际，制定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计划。至少开展一次党史相关主题党日活动、一次《党章》学习讨论、一次“我与群众面对面”活动，为职工群众或企业解决至少一个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确保组织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

（二）凝聚共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耳入脑、深入人心。

1. 加强党史专题学习。制定经发公司党委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将党史学习纳入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中心组开展学习11次。开展“我与群众面对面”活动，征求基层党员干部对经发公司领导班子及成员的意

见建议。定期下发工作提示，指导督促基层党支部做好“规定动作”，鼓励创新“自选动作”，推动学思践悟、融会贯通。党委为公司向全体党员发放系列党史书籍，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开展党史专题学习。

2.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公司各级党组织认真制定“重点民生项目”“重点发展项目”清单，建立党委班子成员“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联系点，定项目、明目标、亮举措、见实效。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积极组织开展“萤火虫”工程，广泛开展大调研、大学习、大讨论、大实践，积极参与“圆梦行动”和“蓝天下的至爱”活动，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

3. 丰富党史学习教育平台。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搭建党史学习平台和载体，组织党员干部参观中共一大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邀请专家作党史专题辅导和举办报告会，开展建党百年“十个一”系列活动。引导党员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党史学习教育，牢记党的历史、赓续红色基因、立足工作岗位、勇担职责使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切切实实的工作成效。

（三）鼓舞士气，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激发热忱、延伸触角。

1. 创新活动载体，推动党史学习走细走实。开展“党史天天学、周周读、月月讲”活动，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工作创新，以党史学习教育提升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机活力。依托发展党员“三考”活动，把党史知识作为“三考”测试重要内容，把红色基因注入发展党员工作的“源头”。以“传承时代精神 共创美好经发”演讲活动为契机，围绕百年党史内容，结合经发公司“扁担精神”“打铁精神”“纤夫精神”，以比赛形式进行理论“微宣讲”，并组建“党支部书记宣讲团”、“经发青年宣讲团”及“工匠劳模宣讲团”，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立体化宣讲格局。

2. 突出重要节点，推动党史教育多点发力。清明时节，组织开展“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活动；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

慰问曾受到国家三代领导人接见的老劳模顾来生，以弘扬劳模精神，凝聚奋斗伟力；五四青年节，组织开展“青春向党别样红”党史学习特色活动，带领团员青年集中开展党史读书会，参观红色教育基地，传承红色初心，坚定“永远跟党走”信念；六一儿童节，开展亲子学党史活动；“七一”期间，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开展“两优一先”评选、微党课专题展播、劳模工匠专题宣讲等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八一建军节，与共建单位联合举办“百年恰风华 铁血铸军魂”主题活动，丰富“节日里的党史教育”。

3. 坚持红色引领，延伸为民服务触角。围绕办社宗旨，聚焦粮食检测、国家储备粮保管等多项专业技术，组织开展“师带徒”仪式，让传统的“师带徒”活动彰显新时代的独特作用和价值。设立“经发党群微家”，不断丰富党群服务功能。基层党支部联合开展“学党史、守初心、担使命、共奋进”活动，重温入党誓词，为20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过政治生日。作为市级“党支部建设示范点”的鼎丰公司党支部，将党史学习教育与“中华老字号”品牌经营深度融合。

（四）团结奋斗，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融入中心、开拓新局。

1. 服务大局促发展。充分运用自有资产，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扩大医疗器械、食品流通、文化创意、生鲜冷链和南上海人力资源特色产业园规模。以金门种子公司、粮油购销公司为平台，基本形成种子、烘干、收储、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粮食全产业链经营模式，成立种子生产综合服务中心，完成奉城新粮库码头工程，推进粮食烘干设施及大米加工车间建设。

2. 比学赶超促提升。按照奉贤区委、区政府关于以经发公司为主体，参与千户民宿—上海之鱼论坛酒店配套项目建设要求，成立推进民宿项目建设工作专班，深入一线开展调研，制定工作方案，打造服务乡村振兴新亮点。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开展“比学赶超 争先夺杯——我为经发做贡献”和深化“高峰杯”争

创活动，使党员干部在比学赶超中领悟初心，在争先夺杯中勇担使命。

3. 全面发力开新局。围绕“十四五”发展战略规划，加快项目建设，投资4亿元，建设奉贤经发社区商业广场项目；引入智慧农贸计量监管系统等信息化手段，加快南桥集贸市场“数字化菜场”建设；打响“怡绿”古树名木养护品牌，做好林地养护工作；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新时尚产业，推进“两网融合”建设，在南桥镇、柘林镇、海湾镇等地建立再生资源回收点231个，对全区127个小区居民提供“定时定点”服务；建立“载盛大数据平台”，设立自助回收服务点——味咕环保小屋，开启24小时自助回收服务功能，打通垃圾回收服务“最后一公里”。

二、存在问题

（一）学习成果转化有待加快。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的作用发挥不够明显，分类分层指导基层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不够具体化、精准化，基层党史学习教育典型推广只见“盆景”不见“花园”，引导和激励公司全体党员最大限度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上有待加强，长效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学习实效作用有待加强。按照奉贤新城发展定位，统筹资产经营、招商引资、为民服务、对外投资及创新转型发展等各方面工作中，深入思考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上做得还不够，更好运用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指导实践上有待加强，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发展上有待加强。

（三）宣传工作力度有待加大。围绕党史学习教育重点内容，在丰富新时代党的理论宣讲内涵上下功夫还不够。宣传工作的敏锐度不够高，与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有一定差距。运用新媒体技术开展宣传引导工作的自主性还不够，工作效率还有待加强。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加快学习成果转化。坚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贯穿全年的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牢牢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和目标要求，全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推进“四史”学习教育，深化对党的光辉历史的学习掌握。结合经发公司“十四五”规划和年度重点工作清单，凝心聚力，担当实干，创造更多发力点，塑造更多“特色”和“个性”，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二）提升学习教育实效。坚持把学习党史和促进主营业务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结合“比学赶超争先夺杯——我为经发作贡献”实践活动、“高峰杯”争创活动，立足实际，切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勇于奋斗，切实探索出一条符合经发公司实际的发展新路。把学习党史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深入调研，问需于民，找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思想上解惑、精神上解忧、文化上解渴、心理上解压，以更大力度为职工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组织党员干部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两优一先”先进集体和个人学习，以典型为引领，向典型看齐，更好地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三）浓厚学习教育氛围。深挖红色文化资源，弘扬经发公司光荣的“三种精神”，切实把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宣传教育资源。进一步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教育活动，不断浓厚党史学习教育氛围，及时宣传报道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动态消息、创新举措和显著成效，及时学习上级主流媒体相关重点新闻报道、言论评论、先进典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经发公司做强做优做大注入新动力。

（作者单位：上海市奉贤区供销合作总社）

红色合作社史话

● 朱国栋

近代合作思想在 19 世纪开始盛行于欧洲。我国合作思想的传播和合作事业的创办，开始于五四运动前后，当时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传播的，但它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

孙中山先生在其民生主义第一讲的内容提出以“合作”解决民生问题的主张，南京国民政府为巩固其“正统”地位，标榜贯彻孙中山遗教，对合作运动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在国统区内各省推行。

红色合作社与上述的合作社完全不同，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中诞生，在革命根据地广泛发展的合作经济组织。

红色合作社在工人运动中诞生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合作社组织，把合作社作为维护工人利益的重要组织，作为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重要形式。1922 年 7 月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决议案》《附加决议案》中提出，“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自卫的组织，共产党要重视此种组织。”因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产生了第一批合作社。

1922 年 7 月创办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第一个成规模

的工人消费合作社。

1921 年 6 月，毛泽东、何叔衡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长沙后，于同年 10 月建立中共湖南支部。1922 年 5 月，成立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辖今湖南全省及江西萍乡地区。毛泽东任中共湘区委的第一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郭亮。

1921 年秋，时年 28 岁的毛泽东以走亲访友的名义第一次来到安源，准备在安源发动工人运动。年底，湖南党组织派李立三等到安源开展工作。1922 年 2 月，建立了中共安源支部。同年 5 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7 月，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创办和发展，减少了奸商和矿局对工人的中间剥削，对于改善工人的经济生活，团结工人坚持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9 月初，毛泽东再次到安源，对罢工作了部署。之后，刘少奇也来到安源，加强对罢工的领导。9 月 12 日，李立三主持召开安源支部会议，并成立罢工指挥部，由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经过充分的准备，安源路矿工人于 9 月 14 日举行大罢工，取得了

全面的胜利。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由安源路矿党支部书记、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兼任总经理，毛泽民为消费合作社兑换股经理。李立三卸任消费合作社总经理后，由易礼容任第二任总经理。1923年7月毛泽民被推选为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第三任总经理。合作社深入调查，工人们最需要什么，他们就千方百计保障供给，做到任何时候都不缺货。而且，消费合作社售出的货物价格一般比当地市场至少便宜1/3以上。

消费合作社租用刘胜山的“刘协记”杂货店，这是一幢450平方米二层砖瓦结构的综合商品楼，坐落在安源镇老街的十字街口，这在当时是当地一条繁华的街道。

最初，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集资百元（银元），附设在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内，社员有30余人。1922年9月安源工人大罢工胜利后，经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决定，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股票以筹措合作社所需资金。《合作社招股简章》规定：每股洋5角，共招20000股。到1923年初，工人共认购15600余股，股金7845元，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经济实体最早发行的股票。

1922年11月，社员增至1.3万人，资金增至1.86万元，合作社内设兑换、粮食、服务、器用、南货、杂务等经营项目。到1924年12月，合作社资金由18600余元增加到28300余元。

1923年，消费合作社的一份月报表上，记录着当月销售情况：销售大米500石，食盐万斤，食油4000斤，煤油2000斤，布匹约值3000元，日用品值1000余元，兑换银元2万元，售货总额约1.3万元。这对于当时仅有8万人口的安源来说，已是相当可观的数目。1923年8月，合作社商店由一个增加到三个。

在创立安源路矿消费合作社的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系列合作社组织。1922年4月，建立了汕头米业消费合作社，1922年10月建立了同孚消费合作社，它的前身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励志会消费合作社，1922年11月

建立了湖南水口山工人消费合作社，1922年12月建立了长沙笔业工人生产合作社，1927年3月兴办了湖北咸宁县城区职工消费合作社等。

发展合作社是苏区的一项中心任务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形式，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一面生产，一面战斗。当时民主政府把发展合作社作为建设苏区的一项中心任务。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曾说：“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倡导开展合作事业，组织自救。苏区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合作社。据1933年9月江西、福建两省17个县的统计，共有各种合作社1423个，股金30余万元。发展势头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也开始兴起。“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营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地位，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

中央苏区第一家工农银行原来就是合作社性质的：1930年11月7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福建龙岩创办了闽西工农银行，以阮山为行长，邓子恢、曹菊如等为委员。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随即以闽西工农银行为基础，正式成立国家银行福建分行，以李六如为分行行长。这家工农银行总共发行20万元股票，主要由工农群众自愿购买，合作社企业也购买。每股1元。银行盈利，以20%为公积金；20%用作工作人员奖励开支；60%按股分红。工农银行办理储蓄、借贷业务，大力支持个体农民、各种农业和生产合作社，以及从事正当贸易的商人。在促进苏区的工农业生产 and 商品交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颁布《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现将这

一历史文献，照录于下：

第一条：根据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正式宣布合作社为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一个主要方式，是抵制资本家的剥削和怠工，保障工农劳苦群众的有力武器。苏维埃政府并在各方面（如免税、运转、经济、房屋等方面）来帮助合作社发展。

第二条：合作社须有工农劳苦群众组织。富农、资本家及剥削者均无权组织和参加。其种类只限于以下三种：（1）消费合作社——为便利工农群众，贱价购买日常所用必需品，以抵制投机商人操纵。（2）生产合作社——制造各种工业日用品，以抵制资本家之怠工。（3）信用合作社——以便利工农群众经济周转和借贷，以抵制私人高利贷剥削。

第三条：消费、生产、信用合作社之社员不仅兼股东，并且是该社的直接消费者。不合此原则不得称为合作社。

第四条：消费、信用合作社之消费者、借贷者要以社员为主。对于社员，除享受分红外，还有应用低利借贷和廉价购买之特别权利。对于非社员之价目和利息，亦不能超过合作社一般规定之上。

第五条：每个社员其入股的数目不得超过十股，每股金额不能超过五元，以防止少数人之操纵。

第六条：凡工农劳动群众所组织之合作社须先将章程、股本、社员人数和营业项目等向当地苏维埃政府报告，经审查登记后，领取合作社证书，才能开始营业。

第七条：凡条例未公布前，各地所组织之合作社，须照第六条之手续登记并领取证书。

第八条：凡不遵照此条例组织之合作社，苏维埃政府得禁止之。同时对于各种合作社，认为有违反此种条例之行为时，苏维埃政府有随时检查和制止之权。

第九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发展合作社，支持抗日战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新四军相继开赴华北、华中各地，进而形成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苏北、浙东等根据地，

陕甘宁边区则成为各个根据地的总后方，及坚持和领导抗日战争的策源地。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和扩大，经济建设和合作组织也随之发展。对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沟通物资交流，支持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其中以陕甘宁边区合作社的发展较好，并以推广南区的综合性合作经验为主。在1942年，全边区的30多万劳动力中，有24%组织在变工队、扎工队内；消费合作社有800多个，社员15000多人，股金600万元；生产合作社发展了50个社，社员560人，产值230万元。

在毛泽东《组织起来》《论合作社》发表后，合作事业进一步发展。陕甘宁边区合作社的构成从单纯的消费合作走向多种合作经营。如边区的合作资金共21亿元，其中：消费合作资金7亿元，占1/3；运输、生产、信用等合作资金为14亿元，占2/3。合作社共计1280个，其中：消费社369个，生产社376个，运输社398个。信用社86个，医药社51个。

各个根据地的合作事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一般以商业供销合作社为主。1944年底，晋察冀边区有供销合作社3810个，社员68·84万人，股金2·771万元；太行地区，商业供销合作社1074个，社员20多万人，股金2708万元。生产合作社也在发展。在盐阜根据地，1942年，阜宁、阜东两县均建立了手工纺织合作社机构，阜东区还建立了县合作总社。它们开展手工纺织合作，在合作社下设小工场，贷棉花、棉纱给群众，织土布、织毛巾，均收到一定效果。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对抗日根据地发展工业合作社，给予了有力的援助。“工合”是由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及夫人海伦·斯诺、路易·艾黎等，以及我国爱国进步人士共同发起，于1938年8月5日在汉口成立的。“工合”从海外筹集基金和物资，赴各地筹建工业合作社，广泛发展工业，支援抗战。

工合对抗日根据地的支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本地资源优势的工业。例如：“陕北工合”大力发展棉布纺织合作社，仅1942年3月至12月间就建起了9个纺织工业合作社，月产2464匹棉布。又据1945年6月不完全统计，仅在黄河以北的华北各根据地，就建立了包括10种以上不同类型的工业合作社230多个。在宋庆龄的关怀下，工合国际委员会还把马尼拉的10万元捐款拨给陕甘宁边区发展毛纺织厂。

(二)就地取材，生产急需的日用品，打破敌人封锁。利用本地原料大量开办化工、造纸、印刷、日用杂货、医药等各类生产合作社，生产出农具、五金、瓷器、纸张、文具、肥皂、牙刷及各种食品等等。边区的煤油非常缺乏，油灯工业合作社就生产出多种植物油灯，每个油灯仅售1·2元，二两植物油可点六个小时。陕北盛产各种药材，工合开办的新华医药工业合作社制造出八路军行军散、红白痢疾丸、止咳丸、平胃散等大量中成药。

(三)开办一些直接为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战斗服务的工业。应贺龙要求，“工合”从晋东南搬迁一家小型炼铁厂到晋西北，帮助生产八路军急需的手榴弹。为帮助新四军制造手榴弹、修理卡车、机器等，工合从上海、宁波等地各种器材转运到新四军驻地附近的浙西地区，建立机器生产合作社。1940年“工合”以马尼拉爪哇捐助的资金为主，在晋冀边区建立了几个织布工业合作社，生产大批军布、毛巾等，供应当地抗日游击队。这些活跃在斗争最前线以及深入敌后的“工合”，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拆卸机器、装箱跟随部队转移，又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安装好机器进行生产，被誉为“工合游击军”“经济游击队”“游击工业”。

据1940年初的调查，根据地的“工合”机构数量占全国“工合”的 $\frac{1}{6}$ ，在延安、陕甘宁、晋东南、晋西北、晋冀鲁豫、浙皖、粤赣等边区都先后建立了“工合”。边区的“工合”组织和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利益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工合”成立之初，就得到周恩来的热情支持。毛泽东在1939年9月曾致函工合国际委员会，对在抗

日边区和游击区建立“工合”，表示坚决支持，并充分肯定“工合”对抗日的巨大作用。

合作社随解放区扩大而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合作经济也在不断发展。1948年，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采用农民小生产者所能接受的办法，才能在经济上组织与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这种经济上的办法，就是合作社，就是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以及将来的集体农庄等。而目前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则是在经济上指导农民小生产者的司令部，是组织农村生产和消费的中心环节，是土地改革后在经济上组织农民和小生产者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没有这种供销合作社，我们就不能在经济上去组织领导和指挥千千万万的农民小生产者。”当时中央曾印发全国，作为各解放区的经济建设方针。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合作事业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发展，不仅在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还培养了大批合作社干部，对全国解放后的合作社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当时解放区各地政府均设置合作社管理机构，各种合作事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后主要发展农业互助组织。

1949年，山西省有互助组88万个，参加农户达48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17%；黑龙江省有互助组246万个，参加农户达108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65%。

为了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主要在农村发展供销合作社。例如东北解放区，1949年大约

有 22% 的行政村建立了供销合作社，数量达到 7500 多个，社员 439 万余人，城镇的工矿区也建立了一些消费合作社。

薛暮桥在《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著作中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山东解放区的有关资料，摘录部分。

（一）山东解放区 1947 年 1 月 58 个县县的统计，总共有 7353 个合作社，社员 190 万人，资金 4.25 亿元。有些地区不但发展村社，且已建立区联合社。如鲁中沂山区就有 8 个区联合社，历史悠久的宿山区联合社有 65 个村社，滨海区有 7 个区联合社和 22 个中心社，有 21 个合作社的资金超过 100 万元。

（二）山东合作事业的发展，已成为组织农村各种生产事业的重要力量。碑廊的聚丰合作社和日照的利民合作社均在广阔地区发展纺织生产。聚丰发展纺车 3000 余辆，600 余张布机。利民仅在城关发展纺车 2000 余辆，共有四五个区 36 村群众在它的扶助下从事纺织生产。海阳济元渔民合作社帮助 1400 余户渔民恢复生产，改善生活。广饶医药合作社为全县人民治病，

上半年治愈 12000 余人。在合作社的奖励扶助下，全省纺织生产已能全部自给。全省有 250 万辆纺车，52 万张布机，1947 年共织大布（1 码宽 40 码长）500 万匹，单单纺织收益就能养活 500 万人，约占全省人口六分之一。

（三）临沂生产推进社创办于 1946 年，当时城关无业游民约占全部居民三分之二。生产推进社成立后，发展合作事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城关发展了 4000 余辆纺车，吸收数千妇女参加羊毛纺织，1947 年冬共织毛袜 7 万双。在城关组织了 29 个各种合作社，社员 3500 余人。在城北岔河区帮助 4000 余张布机恢复生产，组织了七个职工合作社，社员 1000 余人，并组织了 54 个村的职工会。在城南傅家庄扶助群众铁业、窑业生产，协助他们每日推销 40 万元成品。又召开滨海、鲁中、鲁南三地区的联合运销会议，组织各合作社实行联合运销。在临沂生产推进社及滨海合作推进社的帮助下，各合作社合资在海口设立一个联合运销站，便利土产运销。

（作者单位：上海商学院）

.....

（上接第 46 页）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十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或者停业整顿、通报有关主管部门吊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决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担任相关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

“国家机关不履行本法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

前款规定的损害赔偿按照个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个人信息处理者因此获得的利益确定；个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和个人信息处理者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作者单位：上海市外滩律师事务所）

贸易驱动效应

● 周军

茶马古道的起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目前西藏地区出土的最早的茶叶遗存，用碳14法测定年代为距今1800年左右，大约是在东汉末期。

然而，这个茶叶并不是西藏本土生产的，而是内地传过去的，这说明早在东汉末年内地与西藏就有了通路，当然还不能称为茶马古道，但与后来的茶马古道是有渊源的。

茶马古道真正形成是在唐宋时期，最早的一条就是唐蕃古道，或者叫青藏茶马古道。经过明清时期的不断发展，茶马古道的其他线路也逐渐形成了。

茶马古道是古代汉藏民族之间的主要贸易通道，它的交易内容非常多样，除了茶叶和马匹的交易，丝、盐、铜也是重要商品，此外还有少量的皮革、药材、珠宝等贸易。

受到中原王朝管控的茶马互市是茶马古道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原王朝需要战马，而青藏高原盛产良马；藏区人民以肉食为主，需要大量饮茶来均衡膳食，茶叶是中原地区的主要农产品，双方供需互补，就催生了火热的茶马互市贸易，进而促成了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古代交通网络，主要途经中国西南地区，这里高原遍布、山脉纵横、河流交错、峡谷幽深，可以说是中

国地形最为复杂的一个区域，这就决定了茶马古道的线路必然是曲折多样的。

各个节点城镇之间的道路往往不具有唯一性，有的道路短而险峻，有的道路长而平坦，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人们会因为自己的需要而对这些道路作出取舍。由于自然环境变化、人类聚居点变迁、政治局势变动等因素，各道路之间经常是此消彼长。所以茶马古道其实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道路网络系统。其主线路称之为青藏线、川藏线和滇藏线。其中青藏线起自陕南，途经甘肃南部和青海地区后进入西藏；川藏线东起雅安，经康定、理塘、巴塘等川边重镇入藏；滇藏线起自普洱，经南涧、大理、丽江、德钦等地入藏。除了这三条主要线路外，茶马古道还包括难以计数的支线，它们纵横盘结、彼此勾连，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密切了内地和藏区的联系。这是茶马古道国内部分的基本线路情况。在进入藏区之后，茶马古道还继续向国外延伸，通往印度、缅甸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

丽江古城是茶马古道上一处重要的城市遗存。其实茶马古道上的关键节点还有很多，比如大理、雅安、彭州、大邑、昌都、巴塘、理塘，还有以前被称为“打箭炉”的康定等等。

除了茶马贸易，还有各种农作物和生活用

品的交换，可以说是涉及沿线各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地区之广、贸易规模之巨，世所罕见，也正是历史上的这些贸易奠定了茶马古道作为汉藏交流、中外交流千年大通道的基礎。

经贸往来自然也会促进贸易相关各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茶马古道为藏区带来了内地的物资，也就传播了内地的文化，包括先进的农业种植和纺织技术、建筑文化、器物文化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茶文化。对于内地来说，茶马古道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藏区文化。此外，在汉藏之间往来的茶马古道商人群体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帮文化。

促进民族融合也是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之

一。除了促进汉族、藏族的交往。还有羌族、彝族、纳西族、白族、蒙古族、撒拉族、裕固族等众多民族都与茶马古道加强了联系和融合。古道上的经济文化往来促进了这些民族在生产生活以及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互动，培育和维系了深厚的民族感情，促进了各民族千年来的交往交流交融。

最初由经贸往来兴起而成的茶马古道，不仅繁荣了沿途的贸易，在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等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茶马古道对于古代中国边疆地区和平稳定所作出的贡献，可以看到贸易的带来的多种驱动效应。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智库）

（上接第 48 页）古村一景。

漫步民风清新平和的唐模古村，在桂风秋馥中体味令人仰慕的徽学人文遗韵。村落溪河蜿蜒，南门北户隔水相望，临水铺设青石路面的老街有风雨长廊遮罩，长廊一侧配置长排靠背条椅供村民憩息闲坐。村外有“小西湖”，平湖曲院花港柳浪可圈可点。此乃村中一富商常年于杭城经商，其母思子心切，无奈山高路远年迈体衰无从成行探望，富商便仿效西湖景致移植家乡，以报孝老母和乡邻四舍。这座岁月悠悠的“唐朝模范村”时至今日仍享誉“全国文明村”，可谓风范千秋。

如今的徽州人散落各地、不宜保存的明清经典古建有选择地原拆原建于潜口古镇紫霞山庄，已然囊括各式宅第、祠堂、路亭、牌坊、石桥等二十余款，错落有致地安置于山丘溪流间，如同自然村落生根。这种以博物集锦展示的手法，不失为一种还原活化徽派古建筑风貌缩影的尝试。

一江秋水东流逝

徽州的“一分水”离不开发源自于此的新安江。深秋时节，桀骜不驯的新安江水也变得厚重起来。临江的阳产古村缘山而居，清一色金黄的土楼群与秋色浑然一体。“阳”指土楼朝阳也；“产”则是方言至于陡坡也。其实，土楼也是徽州传统民宅的一种款式：就地取材，黄土夯墙，独栋构筑，不修边幅，却百年不倒。惜土楼存世不多，只见阳产古村鳞次栉比的土楼群飘逸出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子孙延续。

厚重的新安江畔，长街短巷、黑白相间的古村卧于青山绿水间。走进樟潭古村，瞻仰一株号称“樟树之王”的千年古樟，需十余壮汉方能合抱也。泛舟江上，村落倒映，竹影婆娑，一路水色万顷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简介

● 杨忠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1年8月20日通过，共八章七十四条，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自此，我国终于形成了以《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三法为核心的网络法律体系，为数字时代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提供了基础制度保障。学习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能更好地依法维护公民的权益，避免因不知法而出现的违法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现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主要规定介绍如下，供读者了解掌握。

一、本法的适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活动，适用本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适用本法：

- （一）以向境内自然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为目的；
- （二）分析、评估境内自然人的行为；
-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个人信息及信息处理的定义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

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

三、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的基本要求和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不得通过误导、欺诈、胁迫等方式处理个人信息。”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

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明示处理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保证个人信息的质量，避免因个人信息不准确、不完整对个人权益造成不利影响。”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负责，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所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安全。”

“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四、个人信息处理者可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定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个人信息：

- （一）取得个人的同意；
- （二）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或者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

所必需；

（三）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

（四）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

（五）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

（六）依照本法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依照本法其他有关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同意，但是有前款第二项至第七项规定情形的，不需取得个人同意。”

五、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

“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书面同意的，从其规定。”

“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除本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向个人告知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依照本法规定可以不向个人告知的除外。”

“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法律、行政法规对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规定应当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者作出其他限制的，从其规定。”

六、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特别规定

“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

“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履行告知义务；有本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或者告知将妨碍国家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除外。”

“国家机关处理的个人信息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存储；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进行安全评估。安全评估可以要求有关部门提供支持协助。”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适用本法关于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定。”

七、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

“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有权限制或者拒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处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个人有权向个人信息处理者查阅、复制其个人信息；有本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个人请求查阅、复制其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及时提供。

个人请求将个人信息转移至其指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符合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条件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转移的途径。”

“个人发现其个人信息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有权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更正、补充。

个人请求更正、补充其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对其个人信息予以核实，并及时更正、补充。”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处理者未删除的，个人有权请求删除：

（一）处理目的已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为实现处理目的不再必要；

(二) 个人信息处理者停止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或者保存期限已届满；

(三) 个人撤回同意；

(四) 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违反约定处理个人信息；

(五)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保存期限未届满，或者删除个人信息从技术上难以实现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停止除存储和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之外的处理。”

“自然人死亡的，其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利益，可以对死者的相关个人信息行使本章规定的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死者生前另有安排的除外。”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建立便捷的个人信息权利的受理和处理机制。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的，应当说明理由。

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的，个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主要义务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根据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等，采取下列措施确保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以及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

(一) 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二) 对个人信息实行分类管理；

(三) 采取相应的加密、去标识化等安全技术措施；

(四) 合理确定个人信息处理的操作权限，并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五) 制定并组织实施工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六)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通知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和个人。通知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 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

篡改、丢失的信息种类、原因和可能造成的危害；

(二) 个人信息处理者采取的补救措施和个人可以采取的减轻危害的措施；

(三) 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联系方式。

个人信息处理者采取措施能够有效避免信息泄露、篡改、丢失造成危害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不通知个人；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认为可能造成危害的，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通知个人。”

九、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及职责

“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职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前两款规定的部门统称为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履行下列个人信息保护职责：

(一) 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指导、监督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二) 接受、处理与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投诉、举报；

(三) 组织对应用程序等个人信息保护情况进行测评，并公布测评结果；

(四) 调查、处理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五)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十、法律责任

“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或者处理个人信息未履行本法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由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责令暂停或者终止提供服务；拒不改正的，并处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下转第 41 页)

形形色色的烧卖

● 钱桂华

烧卖起源于明末清初时的绥远，也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市。相传，当时有一对夫妻开了家包子铺，掌柜的弟弟在店里为兄嫂打工，但除了吃饱以外，再无分文。为了挣些外快，弟弟做了些薄皮开口的“包子”与包子搭着一起卖。很多人喜欢这个不像包子的包子，取名“捎卖”，后来就演变成了今天的烧卖。

明清时期，北京有桃花烧卖；江浙一带有荤馅烧卖、油糖烧卖；广州有干蒸烧卖。到了现代，烧卖遍布全国各地，北京有三鲜烧卖；江苏有糯米烧卖、翡翠烧卖、庐江烧卖；山东有临清烧卖；湖北有黄州烧梅；河南有切馅烧卖；上海有凤尾烧卖、下沙烧卖；广州有虾饺、干蒸、牛肉、排骨、猪肝、猪肚等烧卖；四川有玻璃烧卖等。

有趣的是，烧卖在不同地方名称不同，且有出有典。上海嘉定称之为“纱帽”。据《嘉定县续志》记载，“以面为主，边薄底厚，实以肉馅，蒸熟即食最佳。因形如纱帽，故名”。湖北黄州人称之为“烧梅”，因制成后的烧卖，形如含苞欲放的梅花而得名。还有一种说法，早年的烧卖都在茶馆出售，食客一边喝着浓酽酽的砖茶或各种小叶茶，一边吃热腾腾的烧卖，故烧卖又称“捎卖”，即“捎带着卖”之意。现推荐几款特色风味烧卖。

凤尾烧卖。制作：鸡蛋3只打成蛋糊，摊成薄薄的鸡蛋饼，凉后切细末。猪五花肉1500克绞碎入盆中，加精盐50克、白糖味精各20克、5克姜汁水进行搅拌，搅拌时要分次加入1000克清水。火腿25克、青菜500克剁成末。河虾仁100只洗净沥干，加味精5克略拌。面粉870克加入沸水500克，用筷子搅匀，凉后揉成面团

饧透。做成100个剂子，干面粉380克铺在案板上，将剂子用擀面杖擀成直径7厘米、中间厚边缘呈荷叶状大小均匀的烧卖皮子。包上肉馅，在开口处放入青菜末、火腿末、蛋皮末，正中放河虾仁1只。取蒸笼放入烧卖，置旺火沸水上速蒸5分钟左右，用竹丝帚洒清水少许，继续再蒸一二分钟即成。造型美观，色香双佳，凤尾点缀。

三鲜烧卖。猪肉末500克加入黄酱30克、酱油50克、姜末15克、精盐、黄油、味精各5克及适量水拌匀，海参150克去内脏洗净切小丁，虾仁100克去沙线切小丁，加入猪肉末中拌匀，淋上芝麻油50克即成三鲜馅。面粉500克开水烫熟，100克用冷水调成团，两块面混合揉匀，搓成剂子，擀成荷叶边。把馅放在皮坯中间，拢成菊花形。放在笼上用大火旺气蒸10分钟，在表面淋几次凉水，软化蒸熟即可。成品形似菊花，皮薄馅大，咸鲜味醇。

翡翠烧卖。青菜叶2000克，放入有20克食碱（能保持菜色碧绿）的沸水锅里焯至三成熟后捞出，冷水漂清控净水，剁碎盛入盆内，撒上精盐10克、绵白糖500克、加熟猪油400克拌匀即成馅心。面粉400克放入面盆内，加入沸水120克搅拌成半熟面，再用冷水50克揉匀揉透静饧，搓成长条制成40个剂子。用枣核形擀面杖擀成中间稍厚、边缘较薄、有褶皱并略凸起呈荷叶形的皮子。挑馅心35克抹在面皮中间，让馅心微露，在每只烧卖坯包口上点缀3克火腿末，放入有马尾松针的蒸笼内，盖上盖，上锅用沸水旺火速蒸，蒸至面皮不粘手、表面有弹性时为佳，蒸约5分钟即成。面皮不粘手时即熟。成品：皮薄馅绿，色如翡翠，糖油盈口，甜润清香。

徽州晒秋记

● 刘古武

深秋时分，徽州分明变得厚重起来……

“徽州”地名的由来要追溯到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乃撷取绵延百里的徽岭也。九百载的厚重，滋润徽文化独树一帜，催生徽商独步天下，书写浓墨重彩的徽学传奇。

寻访秋阳夕照下的徽州古城，城池外廓、内城分明，瓮城、城门、街巷依旧，披挂着落日的余晖。徽州多牌坊，盛时四百有余，此处地少不足以耕，子民纷纷离乡外出经商，徽商造势，一时鼎盛，荣归故里后又纷纷树碑流芳后世。城中跨街耸立的许国石坊，四面围合的八脚牌坊鹤立鸡群，乃当年游子衣锦还乡时所立，独具匠心的丰碑俨然诠释着徽州历来的厚重。

徽州篁岭晒秋人家的乡愁

“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与庄园”。古徽州身形崎岖，少有平地。婺源江湾镇篁岭古村悬于山崖之上，“篁”者，茂密竹田也。然映入眼帘的却是层层叠叠的庄稼茂密，惟见起起落落的徽派民宅集结，家家户户的墙头、窗前都支起晒架，端放着硕大浑圆的竹匾，平铺着采摘的辣椒青豆花生玉米南瓜稻谷黄

菊……晾晒出秋季收获的丰厚。远远望去，山村里高高低低的老宅前前后后都被五颜六色的点缀所簇拥、晕染、浸润，细数着徽州晒秋人家斑斓的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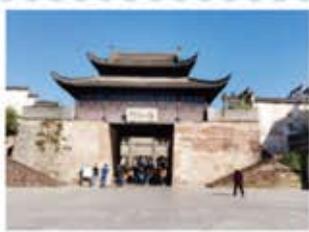
厚重的徽州古村落遍及四野

古徽州民居既有起落于山崖之上的篁岭古村，也有深藏于山坳之间的石城古村。石城乃为山名，其山势峭立宛若城堡荫庇村落。此处古枫巨木环抱，时值清秋，枫林红透，晨雾烟起，粉墙黛瓦在影影绰绰中睡眠惺忪。

崇岭环绕、溪河圆转的菊径古村浑然天成一轮圆形村落，凭借一条条木桥跨河与外沟通，村内徽式老宅环状布局，逐层收缩，形同八卦合围一般。菊径村名乃取自陶渊明“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之诗，傲霜通幽、乐天自然也。

歙县呈坎古村的八卦布局乃天造人设有意为之：八峰外围势如八卦方位，村中溪流形似太极阴阳鱼子午线。先人见此地山川形胜，有田可耕，有水可渔，便择居于此，依山傍水营建居所。呈为阳、坎为阴，遂成村名。但见村内巷陌交错，三街九十九巷迷宫布局其间。古村背倚的葛山高于周边环峰，深秋晨晓，独有葛山披霜。于是“葛山浓霜”遂成（下转第43页）

徽州风光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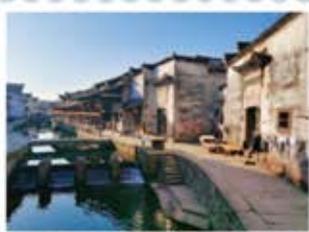
徽州古城



篁岭古村



石城古村



唐模古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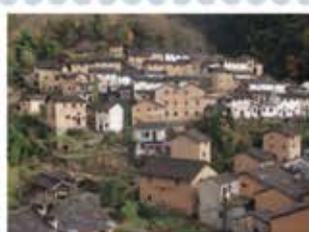
呈坎古村



菊径古村



樟潭古村



阳产土楼



潜口民宅



上海市松江区供销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

